

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资本的终结

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书稿阅读下载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17028>】始终指向最新版本

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资本的终结

作者简介：

姓名：张皓翔

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第五完全学校高中部

邮箱：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书稿独立 doi: 10.5281/zenodo.20417028 (始终指向最新版)

序言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工具，正在迫使我们去面对一个马克思曾在工业时代系统处理过、但今天必须重新审视的根本问题：劳动力问题。

十九世纪，马克思将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来，以此划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全部秘密。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种内在于人体之中的能力。资本家支付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获得的却是它创造的价值与自身价值之间的差额。那把手术刀，至今锋利。

但马克思的手术刀是为解剖资本主义而生的。它的任务，是在资本上升期揭露其剥削机制。而我们的任务已经不同了。当人工智能开始系统性地替代可流程化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当数字平台将劳动力商品化铺展到全部生命领域，一种新的历史趋势正在浮现：生产力越来越要求一种无法被量化、无法被复制、无法被剥削的劳动力形态——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判断、审美、决策、意义赋予——这些能力不是智力劳动的更高级形式，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它不可量化，拒绝成为商品；它产出不定向，无法被纳入劳动过程的控制；它不可复制，无法被标准化地批量使用。剥削的前提——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在它面前全部失效。它是资本统治的结构性边界。

这不是理论上的精巧划分。它直接导向一个结论：资本主义正在生产一种自己无法驾驭的力量。生产力越发展，对这种不可剥削的劳动力的需求就越迫切；而资本越无法容纳它，就越是在给自己制造掘墓人。

社会主义废除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使这种能力第一次从剥削框架中被解放出来，获得了被正式对待的历史机会。但它仍然受到要素化框架的压抑——教育、按劳分配、岗位配置、标准化考核，这些机制将劳动力当作可衡量、可安排、可替换的要素来对待。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被看见了，却难以被真正调用。而共产主义要做的，正是扬弃劳动力要素化本身——让劳动力不再作为要素存在，让每一个人的判断、决策、审美、意义赋予能力，成为社会性生产的主导，让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在具身劳动中复归为人自我实现的途径。

这一概念并非凭空而来。它最早在《要素的枷锁》中作为共产主义运行逻辑的一个构件被提及，但未获得理论化的处理。后在《意识的宣言》中集中讨论，却因概念混乱与逻辑断裂而未能完成。本书正是在对前作的批判性反思与理论推进中，试图完成一次系统化的概念建构。

这不是对马克思的修正，而是在他所开辟的方法论道路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推进概念的发展。他的任务是解剖一个已经充分展开的资本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个尚在生成中的未来之物进行理论推演。

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张皓翔

2026年5月29日

目录

| | |
|-------------------------------|----|
| 第一章劳动力的时代化拓展 | 3 |
| 第1节 马克思主义下的劳动力 | 3 |
| 第2节 劳动力的时代化重构（劳动力概念的时代化重构） | 6 |
| 第二章 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 11 |
| 第1节 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 | 11 |
| 第2节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 13 |
| 第三章资本统治的边界 | 17 |
| 第1节 剥削与不可剥削 | 17 |
| 第2节 剥削于资本的根基性地位 | 19 |
| 第3节 资本在自我的狂欢中走向灭亡 | 20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初步登场与组织困境 | 23 |
| 第1节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 | 23 |
| 第2节 首次正式登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社会主义社会 | 26 |
| 第3节 过渡阶段的辩证法与历史意义 | 29 |
| 第五章 共产主义：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最终解放 | 30 |
| 第1节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必然登场 | 30 |
| 第2节 劳动力要素化的扬弃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全面解放 | 32 |
| 第3节 社会性生产与生活性生产：劳动的分化与具身劳动的复归 | 34 |
| 第4节 各取所需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 35 |

第一章劳动力的时代化拓展

第1节 马克思主义下的劳动力

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便是在工业时代将劳动与劳动力最为严谨、绝对地分离开来，并将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划开资本主义全部奥秘的核心抓手。在马克思之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触及了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命题，却始终无法挣脱一个根本性的理论困境：如果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劳动的价值”又由什么决定？斯密和李嘉图在不同的地方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却始终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因为当他们说工人出卖“劳动”时，便陷入了一个循环论证：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马克思的突破正在于此。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从来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种潜在于人体之中、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被调用的能力。劳动是劳动力的实际使用，是能力的展开和消耗过程。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是劳动力这一商品，支付的是它的价值；但在生产过程中，他获得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创造价值的能力本身。而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可以超出它自身再生产所需的价值。正是这个差额——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全部秘密。一把手术刀，一举划开了那个被古典经济学反复描述却始终无法解释的暗箱。

但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理论贡献所处的历史坐标。工业时代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对正处于扩张和崛起阶段的资本主义发起最坚定的革命冲锋，而对于资本之外如何，并非理论的主要工作。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正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力量重塑整个社会：大工业将分散的手工劳动者集中到工厂的纪律之下，个体的生产活动被纳入社会化的协作体系，一切封建的和宗法的依附关系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取代。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从破坏机器的自发反抗逐渐走向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日益揭示出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最彻底的解剖——揭示它的剥削机制，阐明它的运动规律，论证它的历史暂时性。将理论的全部火力集中于“资本之内”，不是认知上的边界，而是历史任务所规定的战略选择。

马克思本人也明确表明历史发展尚不充分，时代条件并不成熟，故而拒绝为未来食堂开设菜谱。这个著名的隐喻远不止是修辞上的洒脱。它背后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所坚守的科学方法论底线。面对欧文、傅立叶等人对未来社会巨细靡遗的描摹——多少人、多少楼、多少个小时的工作、什么样的分配方案——马克思的态度始终是拒斥的。因为在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时，任何对未来的细致描绘都不可避免地沦为当下的想象向未来的投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空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成为束缚未来人们实践的教条。这一理论自觉，在面对一个尚处在上升期的资本主义时，所体现的正是科学而非空想、严谨而非狂妄的理论品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一种有意的“留白”——相对于《资本论》那样从商品二因素到剩余价值生产、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系统展开，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更多地凝结在若干纲领性文献和批判性论战的片段之中。《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划分，对“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冷静判断，《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原则性提示，《资本论》中关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著名论断——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与严谨，是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讨论都无法绕开的理论标杆，却从未以独立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态呈现。这不是理论能力的局限，而是科学精神的恪守。在历史条件不具备时，对未来社会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严格。

但随着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成为了当下，共产主义成为了在数字资本主义下可以讨论的

发展趋势，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讨论和考察也不再是简单的未来描绘。今天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经过了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经过了挫折、分裂与反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激活为一种现实的理论课题。共产主义也不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理想预设。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人工智能对传统劳动形态的系统性排挤，数字平台对社会生产的全面渗透与重组，数据公域与资本垄断之间的尖锐冲突——正在使某些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向变得可以被科学地讨论。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描绘未来的细节，那是空想；而是说，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运动，已经开始启示出某些确定的、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

资本主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并且越来越启示着未来发展趋势。因此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考察，已不再是对资本主义批判之后用来凝聚力量的口号或者浅尝辄止的叙事，而是在数字时代下资本如何灭亡、怎样灭亡、为何会灭亡的重要理论支持。这是一个理论功能的根本性转变。在过去，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批判“收尾”的功能——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之后，指出历史前进的方向，以此凝聚革命的力量。这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完全必要和充分的。但在今天，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系统性地排挤那些以体力与智力之总和为内容的传统劳动力形态，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渗透并重组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而资本对这些变化的回应——平台垄断、算法治理、数据商品化——非但没有消解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和显豁。这些现象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有问题”的重复印证，而是越来越清晰地指示着资本走向终结的具体路径和内在机制。

这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工作，已不再是简单的概括和核心原则的推论，而是从当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的深刻分析，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中可以描述的更进一步的基本原理。它仍无法事无巨细的描写，因为这是空想，但它因历史条件和时代条件的逐渐成熟，已逐渐较之传统理论更进一步。它的理论姿态，从资本主义批判的事后收束转变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核心批判的两翼之一；它的方法，从原则性推导推进到理论性推演。所谓“从原则性推导到理论性推演”，需要做一个关键的澄清。传统讨论绝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外部去构想一个替代方案——恰恰相反，它同样是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之相适应；单个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必然要求有计划的社会生产。这些推导在方法论上是完全正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应用。之所以称其为“原则性推导”，是因为在历史条件尚不成熟时，推导只能到达核心原则的层面——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的生产——而无法展开更为具体的制度形态和实现路径。这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历史本身尚未提供更充分的材料。今天的“理论性推演”，绝不是要否定或抛弃这些原则推导，而是在历史条件更加成熟的条件下，让这些原则获得更丰富、更具体的历史内容：资本如何灭亡、怎样灭亡、为何会灭亡，这些在马克思的时代只能以原则性论断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在今天已经可以从当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矛盾中，进行更深一步的展开。所谓“事后收束”到“核心批判的两翼”，也正是这个意思：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考察，不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之后的“展望”与“附录”，而是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协同作战，一个方向解剖资本主义的当下病理，另一个方向封堵资本主义的未来出路。

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讨论，也并不仅仅是为了描绘美好或者治未病，在当下开始具有了更加现实和直接的功用。传统的社会主义讨论在完成了从基本矛盾出发的原则性推导之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理论功能更多地聚焦于原则的阐释和方向的指明，而无法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灭亡之具体机制的理论论证——这并非理论上的缺陷，而是任何理论都只能从它所属的时代中获得展开的可能性。今天，我们的讨论有条件更进一步：从资本自身的发展逻辑出发，从它自己催生出的、自己又无法驾驭的力量中去揭示它必然走向灭亡的根据。正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侧翼的社会主义推导两翼夹击，最终在理论层面上完成闭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对它的未来出路的彻底否定来最终完成；而对未来社会的推导，则由

对资本灭亡之必然性的论证来交出最终答案。

但无论如何，让我们先回到马克思最深刻的洞见吧。在经典理论中，马克思指出，从人类有类那天起，人就具有劳动能力，但同时又严格的限定了劳动力，是一个人体内激活的、人身体中存在的，每当它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

接下来让我们详细的剖析一下马克思本人对劳动力的认识，可以理解为四个条件与限定。

第一，劳动力并非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历史阶段特有的产物，它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生命的存在。这意味着，劳动力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恒常能力。远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劳动力就已存在；在资本主义消亡之后，劳动力仍将存在。资本主义没有发明劳动力，它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劳动力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这个看起来最朴素的限定，实则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后果：既然劳动力是超历史的存在，那么它就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之外获得其他形态、在其他生产关系中展现其他可能性。这个预判，正是本书后续一切拓展工作的逻辑前提。

第二，它必须内涵于人体中，不能外在于人体。这一限定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关系：劳动力不可剥离于它的载体——活的劳动者个体。资本家可以购买劳动力的使用权，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支配它的消耗和展开，但他永远不可能将劳动力从劳动者身上“摘下来”据为己有。劳动力必须每天、每时从活的个体中重新被调用出来。这构成了劳动者独立性的最终自然基础，也决定了资本必须采用“雇佣”这种间接的、契约的形式来获取劳动力，而不能像占有生产资料那样直接占有劳动者本身。在数字时代，当新的技术手段试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和控制人的意识活动时，这一“内涵于人体”的限定恰恰成为了资本统治无法逾越的自然屏障。当然，这是后文将要详细展开的论题。

第三，它的调用必须服务于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劳动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能量消耗，不是纯粹的生理活动或私人消遣，而是被严格锚定在生产使用价值的活动中的能力调用。这一限定将劳动力的讨论明确限定在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领域之内。但正如后文将要论证的，在数字时代，“生产”和“使用价值”的边界本身正在被重新界定——而这将迫使我们以一种不是否定马克思、而是深化马克思的方式，重新理解这第三个条件的当代含义。

第四，它是一个整体，是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在马克思的经典定义中，体力和智力不是两种劳动力，而是同一种劳动力的两个面向。工业时代的客观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两个面向在生产过程中被笼统地组合在一起，难以在实践上被剥离开来，因此它们在理论上的区分也缺乏足够的现实动力。然而，当人工智能等新型生产工具在数字时代开始系统性地替代那些可流程化、可标准化的体力和智力支出时，这个原本铁板一块的“总和”内部，是否正在出现一道根本性的裂缝？这道裂缝的一侧，是正在被新型生产工具排挤和替代的传统劳动力形态；另一侧，则是那些无法被量化、无法被复制、无法被算法捕捉的能力——我们称之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这个问题，本书将在第二章中进行正面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展开。

这四个条件共同划建出了马克思语境下的劳动力，并在马克思的进一步研究中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具体的结合，提炼出了劳动力的时代化、具体的历史性表现形态——即劳动力商品化，并以此为基点，进行着对资本主义的剖析。这是一次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推演：一个超历史的一般范畴——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定条件下，获得了它的历史特殊形态。劳动力一直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但它作为商品被买卖，却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在这个历史特殊形态上，找到了解剖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阿基米德点。并基于此提出了我们整本书后半部分都将围绕展开与之对话的核心论断：劳动力商品化的价值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2节 劳动力的时代化重构（劳动力概念的时代化重构）

关于劳动力商品化的相关议题暂时不表，那是后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解决劳动力本身的问题。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劳动力概念本身进行一次时代化的重新审视——不是否定马克思的界定，而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去考察这一概念在数字时代所显现出来的新的内在层次。这里，我们需要逐一回到此前总结的劳动力的四个条件，看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各自向我们揭示出了什么。

我们提出了第一个先决条件，即它并非某个时代、某个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而是整个人类史的普遍存在。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提炼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核心。至于是什么核心呢？在传统理论中，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具体来看，生产力中最独特、最活跃的是劳动力。生产力当然包含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但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现实的生产过程的，恰恰是劳动力的调用和展开。没有劳动力的激活，生产工具不过是一堆死物，劳动对象不过是沉睡的原材料。正是劳动力的运用，将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并在不断重复和积累的过程中推动生产工具改进、劳动对象扩展、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增长——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在劳动力的反复运用和代际传承中实现的。也正是因此，我们在《要素的枷锁》一书中，将劳动力作为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红线。

第二个条件是人本。我们说马克思将劳动力严格的限制在活人行为，这正是强调劳动者的独立性。劳动力不能脱离活的个体而独立存在，它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身体中被激活、被调用、被消耗。这一限定在工业时代构成了劳动者人身自由的天然基石——因为劳动力与劳动者不可剥离，所以资本家只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取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使用权，而不能像对待奴隶或农奴那样直接占有劳动者的人身。但在数字时代，这个看似已经解决了的“人本”原则，正在面临全新的挑战。当数字技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追踪、记录和分析人的行为模式、情绪波动、注意力分布乃至潜意识的偏好时，对劳动力的控制开始从外部行为的规训向内部意识的渗透延伸。资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工作时间内支配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支出，它开始试图进入劳动者“活人”的意识内部，影响其偏好、塑造其认知、引导其注意力。在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下，“内涵于人体”这一限定究竟还能否构成资本统治的边界？劳动者的独立性，是否需要从身体层面进一步推进到意识层面来重新捍卫？这个问题，将是第三章讨论资本统治边界时的重要论题。

而第三和第四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为了逻辑的清晰度，我们先解决第四个问题，这是我们处理第三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台阶。首先在历史中或者说在传统领域中，我们强调劳动力是体力与智力的总和，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非常明确：劳动力是“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这里的“总和”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有机的统一——在生产过程中，体力支出和智力支出是同一个劳动行为的不同面向，你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一个只消耗体力而完全不调用智力的劳动，也很难设想一种完全脱离体力基础的纯智力劳动。但是必须指出，随着人工智能这一类核心生产工具的出现，劳动力内部出现了分化。或者更严谨地说，本来就存在的分化，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与社会条件的不充分、生产工具的束缚，这一分化始终无法显现。这不是概念自身的演化，而是客观历史条件的改变使得劳动力内部一直潜在着的差异开始以可见的形态呈现在社会生产的舞台上。那一部分被分化出来的特殊劳动力，在工业时代始终无法以独立的形态出现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之中。它被封锁在私人领域，在表象上仅仅呈现为一种纯粹个人化的能量消耗和力的支出——它不是作为一种有明确社会功能的“能力”被辨识和承认，而是被当作一个活着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发生、无法被社会生产体系系数和吸纳的私人性生理和心理流出。它从未获得过社会化的、体系化的存在方式。但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型生产工具的出现，劳动力内部的一道根本性裂缝开始了时代化响应——即普通劳动力与本文所强调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这一特殊劳动力的分化。

为了充分阐明劳动力形态的分化，我们首先要回到劳动的概念上，对劳动进行拆解。这里作出一个调整：划分成两大类——体力劳动与意识劳动。意识劳动的范围比智力劳动范围大。这个概念调整有其必要的理由。“智力劳动”在通常的用法中，往往指向那些明确具有规划性、推理性、计算性的脑力活动，但它很难涵盖人类意识活动中更为复杂和微妙的领域——诸如情感的投入、审美的判断、价值的决断、意义的赋予，这些都属于意识活动，却未必能被“智力”所穷尽。如果我们仅用“智力劳动”这个范畴，就会在出发点上就遗漏掉意识活动中那些最难以被形式化和算法化的部分。因此，我们将“意识劳动”作为比“智力劳动”高一个层级的上位概念。意识劳动进一步分化为两个形态：第一形态是智力劳动，即有计划、有规划、有目的智力运作行为。这恰恰是传统意义上与体力劳动相对的那种脑力劳动——工程师的设计、管理者的调度、会计的核算、程序员的编码，都属于这个范畴。第二形态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运用。这是本书的核心概念，是那部分从“体力与智力的总和”中随着历史条件成熟而分化出来的、以意识本身为活动场域的特殊劳动力形态。它不是规划和计算，而是判断和决断；不是按既定流程执行，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做出特异性的回应；不是对已有知识的调用，而是对尚未存在之物的创造和对意义的赋予。

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均符合马克思所界定的劳动力概念。它们都是在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调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只不过一个侧重体力，一个侧重智力。智能化机械可替代体力劳动，人工智能则能够逐步完成对有规划、有目的的意识劳动——即智力劳动——的替代。这个判断已经不再是未来学的推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制造业中的工业机器人已经在大规模替代装配线上的体力劳动；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法律文书撰写、财务数据分析、程序代码生成、平面设计等领域正在迅速蚕食曾经属于智力劳动的领地。

由此可见，体力劳动，以及意识劳动范畴内的智力劳动，正被新型生产工具逐步排挤、替代与弱化。这里被排挤的首先是“劳动”本身——那些曾经由人的肌体和大脑去完成的具体活动，正在由智能化机械和人工智能接手。而伴随着这些劳动形态被排挤，它们所运用的劳动力——即马克思意义上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那种可流程化、可标准化、可量化衡量的能力——也随之在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中显露出一种历史性的走向：这类劳动力正越来越不再是生产环节所必须依赖的核心要素。这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而是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所彰显出的一种越来越明确的趋势。

这里需要做一个关键的说明，以厘清一个极易发生的误解。在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中，越来越不被需要的是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特定的劳动力形态——以体力与智力之总和为内容、以可流程化和可标准化为特征的传统劳动力。但同一种趋势也显示出，生产力越来越需要另一种劳动力，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无法被算法化、无法被分解为标准流程的判断、审美和决断能力。换句话说，生产力的发展正在要求一场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重组：旧的、常规的劳动力形态在趋势中被逐渐排挤，新的、意识的劳动力形态在趋势中被要求以主导性的姿态进入生产过程。这只是趋势，不是现实——在当下的生产力体系中，传统劳动力仍然占据着相当的比重，但它的历史地位正在被削弱，它的必要性正在被消解。

但站在资本的视角，活劳动依旧不可或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无论生产工具如何发达，无论自动化的程度如何提高，机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是将其自身的价值按磨损程度逐步转移到产品中去。能够创造出新价值的，只有活劳动的消耗。而活劳动是什么？活劳动正是马克思所界定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它既包含正在被生产力趋势排挤的传统劳动力，也包含正在被生产力趋势召唤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资本需要活劳动来维持价值增殖，但它在两种活劳动形态面前的能力截然不同：对于传统劳动力，资本可以将其商品化、纳入剥削体系、在劳动过程中加以掌控；但对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资本无法量化它、无法复制它、无法预见它的产出，更无法将它纳入既有的剥削框架。资本所依赖的活劳动是一个整体，但它能够有效掌控的只是这个整体中正在被生产力趋势排挤的那

一部分，而对于生产力趋势真正召唤的那一部分，它束手无策。

这正是资本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根本悖论——这个悖论，我们将在第三章展开全面讨论。而在这里，它同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推论：既然资本只能掌控传统劳动力，而传统劳动力又是它维持价值增殖所不可或缺的，那么生产工具对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替代，就永远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处于进行状态，而无法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前达到完成状态。它不是不会推进，而是不能完成——因为彻底完成的那一天，就是资本能够掌控的那种活劳动从生产过程中消失的那一天，也就是剩余价值源泉枯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终结的那一天。

由此便引出一个核心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人身上还有什么要素是必不可缺的？答案便是：作为劳动力本身意识。人工智能与智能化机械的结合，正在以惊人的效率替代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这是事实。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新型生产工具越是强大，就越是暴露出它们自身的一个根本性局限：它们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判断。它们可以执行任何指令，但无法自己设定指令的方向；它们可以生成无数方案，但无法在方案之间做出基于价值的选择；它们可以优化既有目标，但无法质疑和重新定义那些目标本身。而这一切——设定方向、赋予意义、做出价值决断——恰恰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所特有的能力。它不是被排挤之后的“剩余物”，而是新型生产工具要充分发挥其生产力所必须依赖的核心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不是替代，而是分工：人工智能承担那些可流程化、可标准化的工作，而人承担那些不可化约的判断和创造。人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在于唯有人的意识能够为生产提供那种无法被算法生成的定向和意义。

这一悖论成立的条件，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这一特殊的能力，资本无法驾驭。因为无法驾驭，所以资本才无法将它纳入既有的剥削体系；因为无法纳入，所以资本才在面对它时暴露出自己统治的结构性边界。这个论点，后文将有专门篇幅展开。

于是第四个条件在数字时代得到了新的阐释：劳动力并非铁板一块，它自身存在着裂缝与分化，但这并不否认马克思的论断，因为在工业时代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因工业时代生产力受限于生产工艺条件的系统性压制而无法被投入到生产之中，所以它总是以个人化的私人化的能量消耗为体现，所以往往被划入休息之中，或者说与智力劳动混为一谈。马克思在工业时代将劳动力界定为“体力与智力的总和”，是完全准确的——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这种裂缝没有显现出来的客观基础，它在理论上也就没有获得独立表达的必要和可能。

详细的说，其实也就是即使在工业时代，一个劳动者调用了这种特殊的能力，但也因为没有适当的生产力条件而难以对象化于社会，或者说难以充分的分化于社会。这里的关键词是“对象化”和“分化”。一个劳动者在操作机器的间隙，对工艺流程做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微小改进；一个工匠在面对一块特殊的材料时，凭借难以言传的经验做出了一个独特的处理——这些行为中都包含着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但在工业时代的生产体系中，这种调用没有技术条件被捕捉、放大和系统化地纳入社会生产过程。它停留在个体的、偶然的层面，无法形成社会分工中独立的劳动形态。于是劳动者对这种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和能力的调用，在当时要么被视为个人化私人化的能量消耗，即马克思所揭示的休闲；要么就是被笼统地纳入智力劳动的运用的劳动力之中，其特殊性尚未显现。这里的“休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所事事的消遣。在马克思的框架中，休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劳动者在休闲中恢复体力、调节精神，为下一个工作日做准备。将意识能力的调用归入休闲，意味着它在理论上是作为“消耗”而非“生产”来对待的，是一种从私人生活中支出的、无法被社会计入生产成本的个体行为。而将它笼统地归入智力劳动，则是用既有的、更成熟的理论范畴去覆盖一个尚未充分分化的新现象。两种误认都源于同一个客观原因：历史本身还没有将这种能力的独立形态推到理论面前。

当第四个条件被理解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一下第三个条件。正如前文所讲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因时代的限制，在工业时代往往被看作过于私人化的、个体性的能量输出。

这本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这是劳动力这一概念作为批判范式的锋利所在。因为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从一诞生就是以批判为使命的——它的任务是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那部分被资本无偿占有的活劳动精准地标识出来。在这种批判使命中，一切无法被资本吸纳和计量的、停留在私人领域的意识活动，当然应该被排除在劳动力的范畴之外，否则批判的锋芒就会被模糊，剥削的边界就会变得不清不楚。这不是概念的错误，恰恰是概念的精准。

但关键在于，锋利来剖析病理的手术刀，如果被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上真的合适吗？解剖刀与手术刀真的能混为一谈吗？解剖刀的任务是切开组织、暴露病灶、呈现病理结构，它要求的是一刀下去干净利落，将所有模糊的、不清爽的组织全部剥离开来，让病灶以最清晰的面目呈现在眼前。手术刀的任务则不同——它不仅切除病灶，还要考虑切除之后如何缝合、如何愈合、如何让机体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生存。两者的逻辑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理清马克思经典理论与我们当下想要讨论的问题的根本区别：经典理论的定位是在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兴盛之时，给出最为冷静、最为锋利、最为刺骨的诊断，进而排除解决的方案。这里的“排除解决方案”不是说马克思不关心未来，而是指诊断本身必须如此彻底、如此不留余地，以至于任何试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修补、改良的“方案”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是诊断所特有的力量，它通过彻底的否定来为真正的变革扫清道路。而我们在资本最后的癫狂之中，通过对当下矛盾运动的考察，对未来社会进行推导，实现对资本最后的合围。也就是说，概念范式发生了迁移，就拿劳动力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来说。范式迁移不是抛弃旧范式，而是意识到旧范式在它原本的任务上仍然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但面对新的任务，我们必须锻造新的概念工具。

在批判理论中，马克思所界定的劳动力这一范式无疑是精确的，它能够有力地抛开当下有影响的因素，进而做出简洁切中要害的诊断。但当我们为未来趋势做推断时，如果仍然这样，那么就会忽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忽略在未来极为关键的、在当下还尚未充分发展的因素。那些在当下可能还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形成独立形态、尚未对社会生产产生系统性影响的因素，如果用纯粹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很可能因为它们“还没成气候”而被忽视。但恰恰是这些因素，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成为决定性的力量。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也正是强调于此吗？首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批判当下诊断问题的理论中，要用批判的方式；在构建和指导未来的理论中，要用构建的方式。不从具体问题出发具体分析，就会造成概念的错位——把诊断工具当作建构工具，把手术刀当作解剖刀，或者反过来。第二，坚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还没有分化、还不是劳动力的，可能在未来成为核心劳动力；有些在既定是主导性地位的，在未来可能被系统性排除。如果将马克思观点简化成教条，那么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辩证法要求的不是恪守已有的结论，而是恪守得出结论的方法——从现实出发、从矛盾出发、从发展出发。当现实变了，矛盾的新形态浮现了，发展的趋势开始明朗了，理论也必须跟着推进。所以笼统地说，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确立的、成熟的、体系化的事物，对它进行剖析与批判。他的研究对象是那个已经在历史中充分展开了自身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的概念工具是为这个已经充分展开的对象量身定做的。而我们的任务是对一个尚发展不充分、仍处在趋势之中的未来之物和当下趋势进行分析，所以我们的范式必须转移，也必须调整。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已经确立了的对象，还有一个正在生成中的对象。这个正在生成的对象——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当下的资本主义框架中尚未获得充分的社会形式，但如果历史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它将在未来的社会形态中占据核心位置。因此，我们的概念必须同时具备两重功能：一方面，它要能够准确地描述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动；另一方面，它要能够为理解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理论框架。这就是范式转移的实质——不是放弃马克思，而是在马克思所开辟的方法论道路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推进概念的发展。

马克思的定义我们拆分的第三条中，具体来看使用价值本质上仍然是于人来说的。使用价值不是物的固有属性，而是物对人的有用性——它取决于人的需要、人的判断、人的意义

赋予。人类几千万年的存在史中，所有的劳动力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人这一物种的存在。这个判断将我们从商品交换的逻辑中暂时抽离出来，回到一个更根本的层面：在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商品化之前，在交换价值支配使用价值之前，劳动力的全部意义就是维持和发展人的生命本身。那么第三个条件更深刻的讲应该调整为：服务于生产，甚至为人这一经济社会体。这里的“调整”不是对马克思的修正，而是对马克思所揭示的那个根本逻辑的进一步延伸。马克思说劳动力的调用服务于生产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服务于人的需要——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巨大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在今日发展尚不充分、还未完全独立于旧有劳动力范畴的，但在未来将成为最核心最关键的劳动力形态，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这一特殊的劳动力进行精准的剖析与考察。因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它所“生产”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质使用价值，而是意义、方向、判断、审美——这些东西的共同指向，恰恰是“人”这个经济社会体的持续和展开。它们不直接凝结为物质产品，但它们决定着物质产品向何处去、为谁服务、以什么形式存在。在一个物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人工智能可以承担大部分常规劳动的未来社会中，这种以“人”本身为对象的劳动力形态，将无可争议地成为全部社会生产的核心。

不过，在此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这三个澄清，是本节所有论证的边界和条件，是防止概念迁移滑向概念滥用的自我约束。

第一，本文所讨论的经济，并非狭义层面的功用、功利类经济，而是广义经济，指代范畴更为广阔的人类实践活动。“狭义经济”把人类的全部活动都压缩为成本收益计算，压缩为功利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种压缩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当我们讨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及其“生产”时，绝不是在说将审美、判断、意义赋予这些活动纳入功利计算、贴上价格标签，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是在论证，在资本逻辑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它不追求价值增殖，而是追求人自身的展开和丰富。

第二，本文对相关概念的使用逻辑，区别于马克思具有批判属性的劳动概念：我们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旨在对现实展开批判。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自我定位。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在其诞生之初和此后一百多年的运用中，始终是一把解剖资本主义的利器——它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揭露得淋漓尽致，把剩余价值的来源追踪得一清二楚。这个批判属性是它的灵魂，是不能被冲淡或丢弃的。但我们引入“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这一概念，不是为了用它再去批判一遍资本主义——那个工作，经典劳动力概念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引入它，是为了承担另一种理论功能：建构性地推导未来。倘若生硬借用其批判立场去解读马克思所直面的问题，只会弱化理论锋芒，造成理论阐释的钝化。一把刀，不能同时又是解剖刀又是手术刀；一套概念，不能同时以批判和建构两种不同的姿态面对两种不同的对象。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说：这是“概念范式的迁移”，而不是“概念内涵的修正”。

第三，本文赋予了劳动力概念一定的哲学意蕴。当讨论的触角从物质生产延伸到意识活动，从商品交换延伸到意义赋予，从资本批判延伸到人类解放时，劳动力概念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一定的哲学重量。由于后续将围绕全人类解放展开探讨，哲学视角的融入实属必然。“全人类解放”不是任何一个经验科学的命题能够单独承担的，它天然地包含着对“人是什么”、“人的自由如何可能”、“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什么条件”这些根本问题的回应。这也是我们反对将该概念原封不动地套用以批判为核心宗旨的理论体系的原因。但同时我们必须郑重声明：我们始终坚守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哲学的意蕴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不是从外部嫁接上去的。我们不搞纯哲学的思辨演绎，我们做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推演——从当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从数字时代资本运动的具体趋势出发，从中推导出概念的演化和未来的方向。这不是哲学的僭越，而是政治经济学在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时必要的自我拓展。

第二章 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第1节 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

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其核心是智力的、按外部规划、有既定流程、可分解可复制的脑力支出。这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只是因这一能力的使用领域不同而出现了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分化。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中，劳动力是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这一定义本身就包含着体力与智力两个面向，二者的区分并非本质性的，而是功能性的。当这种能力主要运用于物质材料的直接加工和身体的机械运动时，它表现为体力劳动；当它主要运用于信息的处理、流程的设计、方案的计算时，它表现为智力劳动。但无论哪一种，它们所运用的劳动力都是同一个来源：那种内涵于人体之中的、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被调用的能力总和。

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其运用过程往往与体力劳动紧密联系。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需要动手绘图或操作计算机，会计师在核算账目时需要翻阅凭证和敲击键盘，程序员在编写代码时同样需要持续地坐在屏幕前进行操作——纯粹的、完全脱离任何体力基础的智力劳动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正如纯粹的、完全脱离任何智力参与的体力劳动同样罕见。这一事实印证了马克思将劳动力界定为“体力与智力的总和”的判断：在生产过程中，体力支出和智力支出是同一劳动行为的两个面向，而非两种可以截然分离的独立实体。

然而，尽管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在存在形态上紧密交织，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仍然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可以将其与本书所讨论的另一种劳动力形态——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严格区分开来的特征。

第一，可流程化。智力劳动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确定的、有序的操作步骤。一个财务报告的编制、一份法律文书的撰写、一套软件程序的设计，都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流程逐步推进。每一个环节的输入和输出可以被明确定义，每一个步骤的规范可以被书面化，这使得智力劳动的整个过程具有了被标准化管理的可能。

第二，标准化。由于智力劳动可以流程化，它就可以被标准化。不同的劳动者按照同一套流程操作，在相同的输入条件下可以获得大致相同的输出。这不是说智力劳动完全消除了个体差异——工程师的水平有高下之分，设计师的风格有优劣之别——而是说，这些差异可以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内被比较、被评估、被排序。标准化的考试可以衡量智力劳动者的能力水平，标准化的操作规程可以约束智力劳动的质量边界。

第三，可复制性。这里所说的可复制性，不是指智力劳动的产物可以被反复使用——虽然这一点也成立——而是指智力劳动的运用过程本身可以被他人学习和复制。一个律师如何分析案件、如何组织证据、如何撰写法律意见，这些方法是可以通过法学院的教育、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和前辈的指导来传授的。一个新手律师通过模仿和学习优秀律师的工作方式，逐步掌握相同的分析和论证方法，最终能够独立处理类似的案件。这种可传授性意味着，智力劳动力不是某一个体所独有的禀赋，而是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教育体系被批量生产出来的能力。一个资深的智力劳动者离职，他的工作方法可以被后来者继承；一个新兴行业的技能需求出现，教育体系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专业和课程来快速供给。资本之所以能够持续地获得它所需要的智力劳动力，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这种能力是可复制的，因此它可以通过教育投资被稳定地再生产出来。

第四，可量化衡量。智力劳动的产出可以被计量。一份报告的字数、一段代码的行数、一个设计方案覆盖的功能点数量——这些当然不是完美的度量标准，但它们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智力劳动的投入和产出。更为重要的是，智力劳动者的能力本身也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测试和评估被量化为分数、等级、证书，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一个可比较的价格。

第五，与主体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智力劳动力的获取和提升，基本上依赖于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一个工程师需要经过数年的专业学习，一个会计师需要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一个程序员需要掌握特定的编程语言和开发框架——这些能力没有一种是先天赋予的，它们全部是后天培育的产物。而教育是有成本的：学费、时间、精力，以及在此期间放弃的其他可能性。这些成本构成了智力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价值可以被大体估算。资本之所以能够将智力劳动力纳入商品化体系，一个根本性的前提正在于此：它的形成过程是可追踪、可投资、可预期的。

第六，可被资本支配剥削。正是因为智力劳动力具备上述特征——可流程化、可标准化、可复制、可量化、可被教育体系批量生产——它才可以被纳入资本的剥削体系。资本可以购买智力劳动力，规定它的劳动时间、工作内容、产出标准，在劳动过程中对它进行监督和管理。智力劳动者虽然不像体力劳动者那样直接操作机器，但他们同样在资本设定的框架内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的方式，产出规定的结果。他们创造的价值超出他们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那个部分——剩余价值——同样被资本无偿占有。

第七，具有可替代性。由于智力劳动力是可复制的——即它的运用过程可以被他人学习和掌握——因此当某个具体的智力劳动者离开岗位时，另一个具备相应资质和技能的劳动者可以接替他的工作。教育体系持续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智力劳动力，保证了资本在市场上始终能够找到可替代的人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智力劳动正在被算法和模型所替代。财务报表的自动生成、法律文书的智能起草、程序代码的辅助编写——这些曾经专属于人类智力劳动者的工作领域，正在被人工智能逐步蚕食。可替代性的根源正在于智力劳动的那些特征：因为它的运用过程是可复制、可按步骤学习的，所以它也可以被同样能够学习和执行这些步骤的机器所模拟。

第八，可预期性。智力劳动的生产过程具有相对稳定的投入产出关系。虽然创造性工作的灵感迸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整体而言，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规定的人力，产出大致可控的结果，这是智力劳动区别于其他意识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可预期性使得资本可以将智力劳动纳入计划管理体系，对其进行成本核算和效率优化。

第九，生产过程与产出相对稳定性。智力劳动的发生条件、运行机制和产出质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预期的。这一稳定性进一步保证了智力劳动力可以被持续地、常规化地使用，它不会突然失效，不会在关键时刻无法被调用，不会产生完全不可预知的结果。它是可靠的生产要素，而非不可控的意识闪现。

正是这九个特征——可流程化、标准化、可复制性、可量化衡量、与主体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可被资本支配剥削、具有可替代性、可预期性、生产过程与产出相对稳定性——共同构成了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在本书的概念体系中，它被归属于“普通劳动力”的范畴，与体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处于同一层级。它们都是马克思所界定的那种“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只是在不同的使用领域表现为不同的劳动形态。它们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本质区别，将是下一节要集中讨论的问题。

第 2 节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它的核心不再是智力，而是判断、审美、决策等关键性、个人化的能力。它指的是人脑固有的能够在具体情形中做出特异性判断，进行不可复制的决策，赋予

独特性意义，设定独到方向的一种最高级、最核心、最不可还原的人类劳动力，它其实也是自主自觉的一种体现。

这一界定需要逐层展开。首先，“核心不再是智力”。智力——在本书的讨论中——指的是那种按外部规划、有既定流程、可分解可复制的脑力支出。这是可以被算法模拟、被人工智能逐步承接的能力。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恰恰是智力所无法覆盖的那一部分：它不是逻辑推演的能力，而是在逻辑推演之前，决定推演方向和判断标准的能力；它不是信息处理的能力，而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凭借全部的个体经验和价值直觉做出决断的能力；它不是对已有方案的优化和选择，而是赋予事物以意义、为行动设定方向的能力。这三重能力——判断、审美、决策——是人脑所固有的，是任何算法都无法真正复制的，因为在每一个具体情形中，它们都需要调用一个活的个体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环境和特定心理状态中所积累的全部生命经验。

其次，“它其实也是自主自觉的一种体现”。这里触及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他在劳动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构建了劳动的结果，他不仅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这种“内在的尺度”，这种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塑造对象的能力，正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所表达的东西。它不是在执行外部的指令，而是在调用内部的尺度；它不是被动的反应，而是主动的赋予。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而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先天禀赋——它内在于每一个活着的人的类本质之中。

它的本质在于数字时代开始显影的劳动力内部的分化。这一判断需要被严格理解。分化不是新事物的创造，而是潜在差异的显现。在工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劳动力内部的这种分化被系统性地遮蔽了——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占据了生产过程的全部可见领域，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由于缺乏对象化于社会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私人领域，未能以独立的形态进入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的舞台。数字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当那些可流程化、可标准化的体力和智力支出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和算法承接之后，劳动力内部一直潜在着的那道裂缝开始显露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除了那些可以被机器替代的“普通劳动力”之外，每个人身上都还携带着一种无法被替代、无法被还原的劳动力形态。这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它的发展趋势，可以沿着三个阶段来把握。

兴起于数字资本主义开始，但此时并不充分，而且常常被资本排挤、打压和无视。资本的本能是将一切生产要素都纳入其可掌控的体系，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恰恰在本体论层面抗拒这种纳入——它不可量化，产出不定向，拒绝计量。面对这样一种无法被其既有框架所捕捉的能力，资本的反应不是单纯的忽略，而是一套系统性的排斥机制。这套机制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运作。一方面，资本通过自身的评价体系和激励结构，大力褒扬那些严格遵循既定规范、在标准化框架内高效执行的人才，让他们获得可预期的、立竿见影的回报——高薪、晋升、社会声望。一个能够按照模板快速完成任务的文员、一个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操作量的流水线工人、一个能够在标准化考核中拿到高分的员工，他们都是这个体系的宠儿，是“优秀”的化身。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展现出强烈自主意识、不按既定框架思考和行动的人，资本则启动另一套话语：他们被贴上“不切实际”、“缺乏执行力”、“不服从管理”、“情商低”甚至“危险”的标签。一个对既定操作流程提出改进建议却被视为“不守规矩”的工人，一个拒绝将工作节奏完全交由算法安排却被评价为“缺乏团队精神”的外卖骑手，一个在服务中展现出个人风格却被批评为“不够标准化”的客服人员——他们的自主意识被资本的标签体系系统地贬低和污名化。资本用这种奖惩分明的二元机制，在文化的层面上系统性地贬低和边缘化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使它尚未登场就被预先宣告了不受欢迎。

在当下的生产体系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运用当然不会因为资本的打压就完全消失。它仍然在大量存在——一个企业家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商业决断，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赋予作品的独特意义，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中提出的全新假设——这些活动中都包含着这种劳动力的调用。资本对这些现象并非视而不见，但它采取了一种更具意识形态功能的处理方式：将这些调用解释为某些特殊个体的“天赋”、“天分”或“个人魅力”。这种解释看似是一种褒扬，实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打压。因为它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从一种普遍的人类能力，窄化为少数精英的专属禀赋——它暗示，判断力是天生的，审美是天才的专利，创造性决策只属于那些“被选中的人”。这种话语的实质，是资本在无法真正驾驭这一能力时，所做出的一种防守型进攻：既然无法将它纳入体系，就通过将它升华为上层人士或既得利益阶层所特有的、高人一等的能力，来否认普通劳动者同样拥有它的事实。一个流水线工人对工艺流程的改进建议、一个清洁工对工作节奏的自主安排、一个收银员与顾客之间的即兴互动——这些日常实践中无处不在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在这种“天赋论”的话语中被系统地抹去了。资本通过将这种能力神秘化和阶层化，进一步强化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级划分。所以它很难正式参与到社会生产的活动中，仅仅是开始。

但是，它介导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个问题将在第三章详细展开，这里仅指出其基本逻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要求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以主导性的姿态进入生产过程，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却无法容纳这种劳动力——因为它不可剥削。生产力要求它登场，生产关系拒绝它登场，这一矛盾将构成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最根本困境。

它将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和组织。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运用提供了制度前提，从而也为劳动力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在这个阶段，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将不再被排挤和无视，而是被自觉地纳入社会生产的组织体系之中。但是这种组织值得说明，应该只是一种尝试，并不能有效将它组织起来。原因在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具有不可量化、产出不定向、拒绝计量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任何试图以行政化、计划化的方式去“管理”和“组织”它的努力，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它的本质发生冲突。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为它的运用提供比资本主义广阔得多的空间，但仍然无法找到一种完美的方式去充分驾驭它。不过，这些尝试会为共产主义的实践提供思路——它们将以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为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积累经验。

最终，它将在共产主义社会成为最核心、主导性的劳动力，同时参与着社会化生产与生活化生产。这里涉及作者在《要素的枷锁》一书第七章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中所提出的社会化生产与生活化生产的概念。其核心要义是：劳动开始从社会性生产中部分地解放出来，由此在社会性生产之外，形成了一个个人化的、私人化的生产领域——生活性生产。社会性生产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组织方式是通过协商而非指令；生活性生产则是劳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借助社会共有的生产资料，直接为自己进行生产的活动。两者的边界不是模糊了，反而更加明晰。

在这一框架下，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社会性生产中贡献着不可替代的判断和决策，在生活性生产中主导着个人化的创造和意义的赋予。与此同时，那些从社会性生产中解放出来的传统劳动力——马克思所揭示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具身劳动中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相结合，共同构成劳动者作为人的完整生命活动。劳动者在生活性生产中不仅调用意识去判断方向、赋予意义，也调用体力和智力去实际地制作、培育、建造、修缮——不是作为谋生的手段，不是在被外部指令支配的条件下，而是在自主自觉的状态中，享受完整的劳动过程本身。这种具身劳动是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直接呈现：劳动者在其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产出的满足，更是自身能力的全面展开——体力的舒展、智力的运用、意识的创造，在同一个活动中融为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性生产中的具身劳动丰富着劳动者作为人的存在本身。当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得人工智能可以承担绝大部分常规

劳动之后，人类将第一次有机会将主要的社会劳动投入到这种只有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去。

关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界定并没有完成。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它与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的分化并不明晰，二者之间的界限极度模糊。造成这种模糊的原因有两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的原因，因为它要打压、无视这种它无法驾驭的能力，所以不愿意去清晰的划分它们——当然它也没这个本事。资本不仅缺乏划分的意愿，也缺乏划分的能力。因为划分的标准本身——量化——恰恰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所拒绝的。以量化的手段去识别一个拒绝被量化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当下的生产力虽然已经显示出了分化的大趋势，但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仍然大量地与智力劳动交织在一起，尚未获得完全独立的、系统化的存在形态。但限制着发展，它越来越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正如一切历史上曾经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一样，它的诞生是缓慢的、曲折的，但它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它的特征，由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构成。

首先，它是高度特异性、主体性、个人化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每一次调用，都与调用者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社会环境、心理状态高度相关。一个判断之所以是这个人做出的判断，不是因为他掌握了某种通用的方法，而是因为他的全部生命经验——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经历过的成败、感受过的悲欢——都凝结在这个判断之中。换一个人，即使面对完全相同的情境，给出的判断也会不同。这不是误差，而恰恰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本质属性。它的价值正在于这种不可通约的特异性。

它与受教育程度和培育成本的关联性极低，甚至可以说毫无关联。这一特征需要被特别强调，因为它构成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之间最根本的区分之一。智力劳动力的形成依赖系统性的教育，教育需要投入成本，成本可以被计算，劳动力价值因此可以被估量——这是智力劳动力能够被商品化的深层基础。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其运用并不依赖标准化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但它与主体在运用这一能力的那一刻所处的那个具体的、不可复现的环境高度相关联——不仅包括他长期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处境，更包括他调用这种能力的那个特定瞬间的全部情境：他当时的心境、他面对的具体对象、他所感知到的微妙氛围、他被唤起的某一段记忆。正是这些在那一刻汇聚起来的、独一无二的要素，共同塑造了他此时此地的判断、审美和决断。一个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在面对一块世代耕作的土地时，在那一刻，他一生与这片土地打交道的全部经验、他对土壤湿度的直觉、他对天气变化的预感，都在那一个判断中被瞬间调用；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人，在处理家族内部的复杂纠纷时，在那一刻，他数十年在人情世故中积累的全部智慧，都在那一个决策中被凝聚。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活的个体在具体的、处境化的生命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无法被任何课程和考试所复制的经验整体。反过来，一个人可以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却可能在需要做出根本性价值决断的那一刻，因为缺乏那种在具体处境中积累起来的直觉而表现得惊人的贫乏。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教育无关，但与主体在具体处境中、在特定时刻的当下觉知和实践智慧高度相关。这意味着它的形成过程无法被资本投资和规划，它的“成本”无法被核算。连最基本的再生产都无从量化，商品化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前提。

它不可量化，拒绝计量。这里需要做一个重要的澄清：我们所讨论的，不涉及任何关于“计价”层面的问题——那是商品化之后才需要面对的事情。而是在此之前，连最基本的量化和计量本身都被拒绝。量化的前提是找到一个可公度的单位，计量要求对象具有可被度量的稳定属性。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所产出的内容——一个判断、一个审美体验、一个意义赋予——在本体论层面就是不可公度的。你无法用任何尺度去度量它，正如你无法用长度去称重量。这里讨论的全部是量化和计量——连量化都无从谈起，更遑论后续的一切商品化环节。

它的产出具有普遍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人任何时间，只要还活着，没有任何门槛，

都可以产出。这与其他劳动力形态形成鲜明对照。体力劳动需要健康的身体，智力劳动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知识的积累，它们都有门槛。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它内在于每一个活着的人身上，随时可能被调用。这种产出的普遍性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阶层，不依赖任何特定的教育体系，它是每一个活着的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

它的产出还具有随机性与不可预测性。我们不知道它何时可以产出，不确定如何产出，不确定会产出什么内容。它不是一种可以被随时调用的工具性能力。灵感可能在工作时间之外的不经意瞬间降临，也可能在万众期待中迟迟不来。那些最关键的判断、最富创造力的想法、最具颠覆性的审美创造，往往出现在最不可预期的时间和场合。这种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任何试图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纳入常规化管理体系的努力都面临着根本性的困难。

还有产出的不定向性。我们不知道它产出的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这无法预测。这一点十分重要，涉及到我们后边的一个理论基石。就是说，它产出的到底是正向的积极的还是负向的消极的，还是没有任何影响，都是有可能的。一个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一个审美创造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一个意义赋予可能引领一个时代，也可能被历史证明是一场虚妄。而且，正向和负向的标准本身也是历史的、变化的——今天被否定的东西，可能在明天被重新发现价值；今天被推崇的东西，可能在明天被重新审视。这种不定向性意味着，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仅抗拒资本的剥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抗拒任何一种试图预先评价和管理它的社会机制。

最后是它的不可复制性，非流程非标准化，以及最重要的不可剥削性。这里所说的不可复制性，与智力劳动力的可复制性形成根本对照。智力劳动力的运用过程可以被他人学习和复制——律师可以向律师学习，会计师可以向会计师学习——因为它的方法是通用的、步骤是可分解的、逻辑是可传授的。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所做出的判断和决断，却极难复制到别人身上。一个人运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去做出一个高度个人化的决策时，这一决策包含的不仅是逻辑，更是这个人在特定时刻、特定情境中的全部感受、直觉和价值判断，这些东西根植于他独特的生命史，另一个人即使完全了解决策的内容，也无法“学会”去做出同样的决策。因此，它非流程非标准化——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方法、步骤和规则，可以保证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按照预期的方式产出预期的结果。任何将之流程化的尝试，都是在否定它的本质。而不可剥削性，则是所有上述特征的综合结论，也是本书全部论证的核心落点之一。因为不可量化，所以它无法被纳入任何需要以量化衡量为前提的体系；因为产出不定向且不可预测，所以它无法被纳入资本的劳动过程控制；因为不可复制，所以它无法被标准化地批量使用。剥削的全部条件——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在它面前都失效了。这一结论对于理解资本统治的边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将是第三章的中心论题。

第三章 资本统治的边界

第1节 剥削与不可剥削

在前面我们指出了智力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力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一个显著差异便是可剥削与不可剥削。这不仅仅是我们用来对这一概念进行的分类学特征划分，更是我们理解资本统治边界的关键、理解资本主义灭亡的突破口。剥削是资本逻辑的核心——资本的全部运动，从购买劳动力到组织生产过程，从占有剩余价值到扩大再生产，都围绕着剥削展开。如果有一种劳动力形态在自体论层面拒绝被剥削，那么资本的统治就在这种劳动力面前遇到了结构性的边界。这个边界不是临时的障碍，不是技术水平的局限，而是资本作为一

种生产关系的根本限度。因此，可剥削与不可剥削的分界线，就是资本统治的有效疆域与禁忌之地之间的分界线。

首先是智力劳动所使用的劳动力的可剥削性。正如前文所讲，它本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力，即体力与智力的总和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它固然可以被置于资本的剥削与支配之下，它可以成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它的劳动过程当然也可以在资本的掌控下进行。这个要结合我们之前定义的特点，与马克思对剥削得以实现的两点要求进行讨论。

马克思的两点要求，第一个是形式吸纳，可以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形式吸纳回答的问题是：劳动力如何进入资本的生产体系。这个进入的前提，是劳动力必须能够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它有价格，可以被购买，可以被作为生产要素纳入资本循环。我们在第二章对智力劳动力特征的分析，已经系统地证明了它满足形式吸纳的全部条件。智力劳动力是可量化衡量的——它的能力可以通过考试、证书、绩效评估被度量和排序，因此它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一个可比较的衡量尺度。智力劳动力与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它的形成依赖系统性的教育投入，这些投入的成本可以被计算，因此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被大体估算，它的价值由此被锚定。智力劳动力是可复制的——它的运用过程可以被他人学习和掌握，教育体系可以批量生产出具备相同资质的新劳动者，因此资本始终能在市场上找到替代人选。智力劳动力具有可预期性和相对稳定性——它的生产过程投入产出关系稳定，不会突然失效。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形式吸纳的完整条件：智力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可以被购买，可以在流通领域实现它与资本的交流。

第二个实质吸纳，就是劳动过程在资本的掌控下进行。实质吸纳回答的问题是：劳动力进入资本体系之后，其使用过程如何被资本支配。仅仅购买劳动力是不够的——如果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资本就无法确保剩余价值的榨取。资本必须能够规划劳动过程、分解劳动步骤、监督劳动质量、控制劳动节奏，将劳动者的活劳动真正纳入资本设定的轨道。智力劳动力同样满足实质吸纳的条件。智力劳动可流程化——它能够被分解为确定的、有序的操作步骤，每一个环节的输入输出可以被明确定义。智力劳动可标准化——不同的劳动者按同一流程操作能获得大致相同的输出，这使资本可以制定统一的作业规范和考核标准。智力劳动可被支配剥削——它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产出标准都可以由资本规定，劳动者在资本设定的框架内执行任务。智力劳动具有可替代性——即使某个具体劳动者离开，教育体系培养的后来者可以接替，甚至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替代越来越多的智力劳动岗位。资本对智力劳动的实质吸纳，在泰勒制的科学管理、福特制的流水线、当代数字平台的算法调度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

因此，智力劳动所使用的劳动力，完全满足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双重要求。它可以被剥削，也正在被剥削。它处于资本统治的有效疆域之内。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不可剥削性，则恰好构成上述条件的全面否定。首先我们要讨论成为商品，要实现什么？

第一点可量化。这是市场给商品衡量和交换的前提。任何商品要进入流通领域，就必须被还原为某种可公度的单位——长度、重量、时间、货币额。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就是它能够被量化为可以比较的尺度。智力劳动力正是通过教育背景、考试成绩、技能证书、绩效指标等被量化的。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第二章中我们已反复论证：它不可量化，拒绝计量。一个判断、一个审美体验、一个意义赋予，在本体论层面就是不可公度的。你无法用任何尺度去度量它，正如你无法用长度去称重量。连量化都无从谈起，就更不存在成为商品的可能。

第二点相对稳定性，强调并非我们日常中理解的那样。在日常语境中，“稳定”意味着不波动、可预期。但商品交换所要求的稳定性，不是概率意义上的数量稳定，而是产出性质的确定——购买者至少要知道他买到的是什么。金丝楠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金丝楠木生长周

期极长，而且树干很容易中空——长着长着，中间就空了。做高档家具需要整块的实木大料，不能靠板材拼接，所以只有那些芯材完整饱满的才真正具有商业价值。一片金丝楠木林，砍十棵树可能只有一两棵能开出完整的大料。在常规理解上，这种产出极不稳定。但这并不妨碍金丝楠木成为商品，更不妨碍它成为市场上价格惊人的名贵木材。原因何在？因为我们至少确切地知道，一旦它产出，它是什么——它是金丝楠木，它可以制作家具或工艺品。它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是确定的，方向是已知的。商品交换不需要产出数量绝对稳定，但要求产出的性质可以被认知和预期。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正如我们前言所讲的，其产出具有不定向性与随机性。它无法被确定：它如何产出？何时产出？何地产出？怎样产出？甚至连产出的东西的性质也不确定，连它的正向和负向都不确定。一个决策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一个审美创造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一个意义赋予可能开创方向也可能终成虚妄。这种不定向性意味着，它连“是什么”都无法事先确定，因此在商品交换的逻辑中根本无法被定位。它不具备成为商品所要求的那种最低限度的性质确定性。

以上两点，已经使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无法满足形式吸纳的最基本条件——不能成为商品，就无法进入资本的购买和流通环节。

第二，劳动过程在资本的掌控下进行。这就是实质吸纳的要求。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其不可复制性、不稳定性以及随机性和不可预见性，导致它无法被资本实质吸纳。实质吸纳的核心是控制——控制劳动过程、控制产出节奏、控制质量水平。控制的前提是预见——你只有预先知道它要产出什么、如何产出，才能去规划它、管理它、优化它。但你无法在产出之前预见它要产出而去控制它。它的调用时机不可预测——灵感可能在工作时间之外的不经意瞬间降临，也可能在需要它时迟迟不来。它的产出内容不可预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判断、什么样的审美、什么样的意义赋予，在产生之前无人知晓。它的产出方向不可预测——正向还是负向、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创造性还是否定性，全部未知。面对这样一种劳动力，资本的所有控制手段全部落空：无法制定流程——因为流程要求步骤可分解，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是不可分解的。无法进行监督——因为监督要求有标准可对照，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拒绝任何标准。无法考核绩效——因为绩效要求有量化指标，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拒绝计量。

因此资本无法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进行剥削，无法支配。形式吸纳在它面前失效——它不能成为商品；实质吸纳在它面前失效——它不能被控制。剥削的两个必要条件全部不满足。资本面对这种自己无法驾驭的力量，只好启动了它最为擅长的把戏——就是忽视它。这种忽视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结构性的必然：既然无法纳入体系，就只能在理论上不承认它的存在，在制度上不为其留出位置，在话语上将它贬低为私人的消遣或精英的天赋。忽视，是资本在自身边界面前唯一的防守姿态。而正是这一边界，将成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灭亡的突破口。

第2节 剥削于资本的根基性地位

在展开资本统治边界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回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不可剥削”对于资本来说是致命的？答案在于剥削在资本逻辑中所占据的根基性地位。这一节完全延续经典理论的论述，主要阐明这一命题的含义。

剥削不是资本的诸多特征之一，而是资本的存在方式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逻辑是清晰而彻底的。

资本的直接目的是价值增殖。资本是追求价值增殖的价值——这是资本最本质的规定。资本家投入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织生产过程，最终获得商品并出售，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比最初投入更多的价值。这个“更多”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而资本的全部运动都围绕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展开。

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机器、厂房、原材料——只是将自身的价值按磨损和消耗程度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它们不创造新价值。创造新价值的，只有活劳动的消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这一原理：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铁会生锈，木会腐朽，不织也不编的纱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但活劳动不仅能保存和转移旧价值，更能创造新价值——它在消耗自身的过程中，在产品中对象化了比自身价值更多的价值。这个超出部分，就是剩余价值。

因此，剥削——对活劳动创造出的超出其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不是资本的偶然选择，而是资本的必然条件。资本如果不剥削，就无法增殖；资本如果不增殖，就不再是资本。资本主义的全部上层建筑——它的市场体系、它的法权结构、它的国家机器、它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保障和维持这种剥削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是资本逻辑的核心，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不可剥削”对于资本而言不是一种局部的困难，而是一种根本性的威胁。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证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可剥削——它既不能满足形式吸纳的条件（不可量化、产出不定向，无法成为商品），也不能满足实质吸纳的条件（不可预测、不可复制、不可控制，无法被纳入资本的劳动过程）。如果这种不可剥削的劳动力形态，仅仅是一种边缘的、次要的、不进入社会生产核心的例外现象，那么资本完全可以忽视它——事实上，资本也正是这样做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已经论证了一个历史趋势：在数字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对传统劳动力形态的系统性排挤，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正在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主导性劳动力形态。这就不再是“存在一种无法剥削的例外”，而变成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种最核心的劳动力，恰恰是无法剥削的”。

当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指向一种不可剥削的劳动力形态，而资本的生存却绝对依赖剥削时，矛盾就达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这个矛盾不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般性危机——一般的经济危机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周期性波动，它们可以被经济结构调整、国家干预、市场扩张所暂时缓解。这个矛盾是根基性的：它发生在资本逻辑的最底部，发生在剥削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它无法被任何调整所化解，因为它的实质是：生产力要求一种无法被剥削的劳动力成为主导，而生产关系却只能容纳可剥削的劳动力。这正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讨论的命题——资本在自我的狂欢中走向灭亡——的逻辑起点。

第3节 资本在自我的狂欢中走向灭亡

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一个道德命题，而是一个逻辑命题。道德批判可以揭露资本的血腥与不义，可以从情感上激发对更公正社会的向往，但它无法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资本为什么必然灭亡？它以什么方式灭亡？对于这些问题，只有从资本自身的运动逻辑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才能给出科学的回答。这正是本书前三章全部理论准备的最终指向。在第一章中，我们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论证了在数字时代，劳动力内部出现了一道根本性的裂缝——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从“体力与智力的总和”中分化出来，开始以独立的形态显现在历史舞台上。在第二章中，我们对这一新型劳动力进行了系统的概念界定：它的核心是判断、审美、决策，它具有不可量化、产出不定向、不可复制、不可剥削等一系列与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节截然不同的特征。在第三章前两节中，我们分别论证了剥削在资本逻辑中的根基性地位，以及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本体论层面拒绝被剥削的必然性。现在，这些理论准备将汇聚到一个终极命题上：这些发现，如何导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资本正在制造——严格地说是使之显形——一种自己不愿承认、更无法驾驭的力量。这里“使之显形”与“制造”的区分，对于理解整个论证的逻辑结构至关重要。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是资本凭空创造出来的。从人类有劳动那天起，它就内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被遮蔽着——被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压制，被资本的剥削逻辑所排斥，被理论上“休闲”和“智力劳动”的范畴所覆盖。资本没有创造它，但资本自身的发展逻辑却在不经意间为它的显现创造了条件。当资本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率而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和智能化机械的发展时，它实际上是在拆除那道遮蔽着裂缝的屏障。体力劳动被替代了，智力劳动被替代了，劳动力内部一直潜在着的那道裂缝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资本自己的运动逻辑，迫使那个一直存在但一直被忽视的力量，以不可避免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要理解这一力量为何最终必将吞噬资本，就必须深入考察资本当前所处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剖析。

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数字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开始与智能化的机械、机器系统性地结合。这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而是一场生产力结构性的重组。机械延伸和替代了人的体力，人工智能则在延伸和替代人的智力的道路上持续推进。制造业中的工业机器人已经在大规模替代装配线上的体力劳动，而知识产业中的白领工作——财务报告的生成、法律文书的起草、程序代码的编写、设计方案的产出——正在被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蚕食。

这里必须做一个关键的澄清。我们说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正在被排挤和替代，绝不等于说活劳动本身正在被替代。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石，也是本书始终坚持的根本原理。机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是将自身的价值按磨损程度逐步转移到产品中去。能够创造出新价值的，永远只有活劳动的消耗。问题不在于“活劳动还重不重要”，而在于“活劳动以什么形态存在”。当体力劳动被机械替代、智力劳动被人工智能替代之后，活劳动并不会消失，而是向那些尚未被、也无法被机器和算法替代的领域转移和集中。

这就引出了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根本趋势。人工智能这类生产工具越是强大，就越是暴露出它们自身的一个根本性局限：它们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判断。它们可以执行任何指令，但无法自己设定指令的方向；可以生成无数方案，但无法在方案之间做出基于价值的选择；可以优化既有目标，但无法质疑和重新定义那些目标本身。新型生产工具的效力不是自足的，它们需要一个自己不具备的要素来驱动——那个设定方向、赋予意义、做出价值决断的要素，正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工具越强大，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需求就越迫切。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力逻辑，指向的正是这种无法被算法生成、无法被机器代劳的人类核心能力。

与此同时，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传统劳动力——以体力与智力之总和为内容、以可流程化和可标准化为特征——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下，越来越不再是生产力发展所必须的关键内容，甚至开始成为累赘。这里说“累赘”，不是要贬低工人阶级在历史和当下所承受的苦难和所作出的贡献。没有那些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付出，人类文明不可能达到今天的高度。这里说的是一个来自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客观判断：当智能化机械和人工智能能够更高效、更精准地完成那些传统劳动任务时，继续让劳动者被束缚在这些劳动形态中，就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只是资本维持剥削关系的需要。

其次，是生产关系的反制。如果说生产力维度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生产力需要什么”，那么生产关系维度的问题就更加尖锐：资本需要什么？资本能做什么？

资本需要活劳动。这是马克思已经论证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剥削是资本的生存方式，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这一点，在上一节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证。但问题在于，资本所需要的活劳动是一个整体——它既包含正在被生

产力趋势排挤的传统劳动力，也包含正在被生产力趋势召唤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而资本在两种活劳动形态面前的能力截然不同。对于传统劳动力，资本驾轻就熟。它可以将其商品化，纳入剥削体系，在劳动过程中加以控制。智力劳动力可量化衡量、可流程化、可标准化、可复制、可被教育体系批量生产——所有这些特征，都使它完美地嵌入资本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机制。但对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资本束手无策。它不可量化，因此无法被衡量、无法成为商品、无法进入流通环节。它产出不定向且不可预测，因此无法被纳入任何需要控制和预期的管理体系。它不可复制，因此无法被标准化地批量使用。剥削的全部条件——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在它面前全部失效。

这正是资本在数字时代面临的真正困境。它不是简单的“生产力不需要传统劳动力而资本需要”，而是一个双重的、自我撕裂的矛盾。资本需要活劳动来维持价值增殖，但活劳动中那个被生产力趋势所指明的未来方向——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却拒绝被纳入资本的统治。资本能够有效掌控的，只是活劳动中那个正在被生产力趋势所淘汰的部分；而对于生产力趋势正在召唤的那个部分，它无法正视、更无法运用。

这一矛盾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死结。它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命题在数字时代的重演：曾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在开始反过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资本通过将劳动力商品化、将劳动者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投入工厂和生产线，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那时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适应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在客观上推动历史前进。但在数字时代的今天，同样的生产关系——同样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却成为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为生产力如今要求的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一种无法被剥削的劳动力形态。资本无法正视这种要求，无法正确对待这种力量，因为它正确对待它的唯一方式——承认它、容纳它、让它以主导性姿态进入生产——就意味着资本自身的终结。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枷锁。

这生动地展现了：不是生产力停止了发展，而是生产关系不再允许它按照自己的趋势继续发展。生产力要求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成为主导，而生产关系的回答是：不行。生产力要求活劳动从传统形态向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形态转移，而生产关系的回答仍然是：不行。每一次“不行”，都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一次束缚；每一次束缚，都在积累着最终突破的能量。

有人或许会提出一个质疑：资本虽然无法用剥削的方式对待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但它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占有其成果？毕竟，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运作中，我们确实看到大量这样的尝试——平台通过用户协议占有用户创造的内容，企业通过专利制度垄断创新成果，资本通过各种法律和技术手段试图捕获那些无法在劳动过程中直接剥削的价值。

这一质疑值得认真对待。首先必须承认，这类占有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个创作者在平台上发表作品，平台通过格式条款获得了广泛的使用权；一个发明家申请专利，资本通过购买或诉讼获得专利的垄断收益。但这些占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事后性的、偶然性的。专利垄断的前提是产出可以被识别、被界定、被归入一个确定的产权框架，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产出，连“是什么”都难以确定。一个在当下被忽视的判断，可能在十年后被重新发现价值；一个在特定情境中做出的决策，可能与无数其他人的贡献交织在一起，无法清晰地划定归属；一个审美创造，其影响力可能体现在它激发了后来者的灵感，而非它本身直接转化为商品。资本可以偶然地捕获其中某些产出，但这种捕获始终是局部的、个案的、依赖于特定历史情境的，它无法像剥削工资劳动那样形成一套稳定的、可再生产的、社会化的占有机制。偶然性的占有和制度化的剥削之间的差别，是捕猎与畜牧业之间的差别。

其次，即使我们再退一步，假设这种事后占有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机制，那么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就浮现了：这样的社会还能称为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不是简单的“有钱人挣钱”，而是通过组织生产、购买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来实现

价值增殖。如果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价值来源不再是剥削，而是地租式的垄断占有——通过对专利、版权、数据的垄断权来获取收益——那么它就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了。它可能是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形态，可能是一种技术封建主义，但它不是资本主义。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灭亡”，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它崩坏成一片废墟，而是说那个以剥削为核心的、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历史趋势中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

更进一步说，即使是这种地租式的占有，其本身也是极不稳定的。因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产出具有普遍性——任何人任何时间只要还活着都可以产出，这意味着占有的对象是无处不在、无法圈定的；它的调用时机不可预测，无法纳入任何有计划的捕获机制；它的产出方向不可预知——正向还是负向、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全部未知，占有的结果可能是一笔财富，也可能是一场灾难。这些特性共同决定了，即使资本退而求其次地采用地租方式，也只能在偶然的时刻进行局部的、极小部分的、偶然性的获得，而非常态化占有。资本试图通过地租方式捕获意识产出的每一次尝试，都面临着同样不可逾越的障碍：你无法预知它何时出现，无法控制它如何出现，更无法垄断它的源泉——因为它的源泉是每一个活着的、有意识的劳动者。

当我们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时，必须对“必然”二字做出精确的界定。必然性不是宿命论，不是说我们可以坐等资本主义在某一天自动崩溃。必然性是在如下意义上成立的：只要生产力继续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永久遏制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就将越来越以不可避免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只要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登上历史舞台，资本的剥削就必然失效；只要资本的剥削失效，资本主义就必然不再是资本主义。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推导出来的逻辑链条，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坚实的理论根基。

资本不会束手就擒。它会继续忽视这种力量，否认它的存在；它会继续用奖惩分明的评价体系褒扬驯顺的 executor、贬低自主的思考者；它会继续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包装为精英的天赋，否认普通劳动者拥有它的事实；它会继续尝试用地租、专利、垄断等事后的占有方式来捕获那些无法在劳动过程中直接剥削的价值。但这些努力都只能延缓，无法阻止。因为每一次延缓，都只是让矛盾进一步积累；每一次抵抗，都只是让最终的爆发更加猛烈。

在每一个劳动者的身体内，都蕴含着一种不可还原的、资本统治的禁忌之地。这里需要为“禁忌之地”这个表述赋予理论上的精确含义。它不是修辞性的比喻，而是对资本统治结构性边界的严格命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切进入生产领域的事物都被纳入资本逻辑的统治——土地被私有化，劳动被商品化，知识被产权化，注意力被数据化，情感被平台化。资本的本能是将一切触及的东西都变为可以买卖、可以计量、可以控制的要素。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构成了一个绝对的例外——不是因为它暂时还没有被纳入，而是因为它在本体论层面拒绝被纳入。它与活的人体不可分离，因此无法被占有；它在性质上不可公度，因此无法被量化；它的产出不具有可预期的稳定性，因此无法被控制。它就是资本逻辑的边界，是那个“到此为止，不得再进”的领域。资本可以在外部忽视它、在话语上贬低它、在制度上排斥它，但就是无法进入它、驾驭它、支配它。

也正因为如此，它最终必将吞噬资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越来越被迫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而资本却越来越无法容纳它。它每向前推进一步，资本的有效疆域就收缩一步。当它最终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劳动力形态之时，也就是资本的边界被彻底突破、资本的根基被彻底拔除之日。这不是外部的推翻，而是内部的否定。资本自己的运动逻辑催生出了它无法驾驭的力量，这个力量最终将吞噬资本自己。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在数字时代的今天，这个掘墓人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它不是别的，正是内在于每一个劳动者身上、被资本终身忽视却从未消失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第四章 社会主义：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初步登场与组织困境

第1节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

在第三章中，我们论证了资本无法驾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这一论证的核心，不是从外部对资本进行道德批判，而是从资本自身的运动逻辑中揭示出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与资本生产关系的结构性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局部的、可以调和的，而是根基性的、不可调和的。它的展开，必然将历史推向资本主义的边界，并在边界之外开辟出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

让我们沿着这个矛盾的运动轨迹，一步步展开它的逻辑。

第一，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要求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论证的，在数字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工具正在系统性地替代那些可流程化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这一趋势不是局部的、暂时的，而是结构性的、不可逆的。当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会出现更加先进、我们今天无法预见的生产工具。但无论工具如何演进，其替代常规劳动的基本方向是确定的。当越来越多的常规劳动被机器和算法承接之后，生产过程中唯一剩下的、只有人才能提供的变量，恰恰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这里需要对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当前新型生产工具的本质做一个关键澄清。生成式人工智能，无论其表面上呈现出多么惊人的“创造性”，其底层机制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随机概率推演。它从训练数据中学习各种模式、关联和统计规律，然后在给定条件下，根据概率分布生成最“可能”的输出。它没有想象——想象不是对已有模式的重新组合，而是在头脑中创造出从未存在过的新形式、新意义的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一首在形式上完美模仿李白的诗，但它无法在诗中注入李白那种源于具体生命处境的独特情感和 world 理解；它可以写出一篇结构严谨的论文，但它无法在论文中提出一个真正原创的、颠覆既有范式的思想。因为它所做的一切，本质上是已有信息的重新排列和概率采样，而不是从无到有的意义创造。更先进的未来生产工具，无论其技术路线如何，只要它仍然是基于既有数据和既定规则的运算，就无法跨越这道界限。这道界限不是技术发展水平的问题，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之间的分野：一种是概率推演，另一种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

那么，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做了系统的界定。它是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特异性判断、进行不可复制的决策、赋予独特性意义、设定独到方向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每一次调用，都不是对已有模式的概率性组合，而是调用者在其全部生命经验的基础上——包括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经历过的成败、感受过的悲欢——做出的一个在那一刻独一无二的判断。它不是“最可能的”，而是“我认为对的”；它不是从统计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主体的价值立场和意义世界中生长出来的。一个劳动者在面对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时，他调用的不是数据中的概率分布——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历史数据可供参考——而是他作为一个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无法被任何数据库所穷尽的直觉、判断和创造性。这正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永远不可能被任何基于概率推演的生产工具所替代的根本原因。

因此，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是双重的：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工具正在替

代那些可流程化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另一方面，这种替代本身恰恰使得那种不可被概率推演所替代的能力——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中最稀缺、最关键、最不可替代的要素。生产力越发展，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需求就越迫切。这不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测，而是可以从当代技术进步和劳动形态变迁中观察到的客观趋势。

第二，资本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无法容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详细论证了这一点。资本的生产关系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之上——它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这种剥削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劳动力能够被商品化：可量化、可预期、可复制、可控制。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恰恰拒绝被商品化的一切条件：它不可量化，因此无法被定价；它产出不定向且不可预测，因此无法被纳入劳动过程的计划和控制；它不可复制，因此无法被标准化地批量使用。资本面对这种劳动力形态时，所有的管理工具——绩效评估、流程规范、计划调度、质量考核——全部失效。资本可以忽视它，可以排挤它，可以将它窄化为“天才”的专属禀赋——从而否认普通劳动者也拥有它的事实——但资本无法真正地、制度化地调用它。因为调用它的前提，是承认它不可被剥削——而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资本自身的存在根据的动摇。资本的统治建立在剥削的可能性之上，如果一种劳动力形态在本体论上拒绝被剥削，那么资本在面对这种劳动力时，就遭遇了自身权力的结构性边界。

于是，矛盾便尖锐地呈现出来：生产力发展要求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登场，资本的生产关系却拒绝它登场。这不是一个局部的、可以调和的矛盾。因为资本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劳动力形态而放弃自己的本质——放弃剥削，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也不可能因为资本的拒绝而停止——生产力的发展是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永久遏制的，它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力量，总是在寻找突破生产关系限制的出口。当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当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不可回避地要求进入生产过程的中心时，资本的生产关系就只能让位于一种新的、能够容纳这种劳动力形态的生产关系。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历史的理想，而是资本内在矛盾运动所逼迫出来的必然归宿。它不是对资本的道德否定，而是资本自身逻辑的自我否定。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因为它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更是因为它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登场——开辟了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两阶段革命。两阶段革命不是两个彼此分离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统一的解放进程中的两个有机环节。它们的共同指向，是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从它所受的双重枷锁中解放出来。

第一重枷锁：剥削的框架。

资本主义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第一个束缚，是剥削的框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一种劳动力要进入生产过程，都必须先成为商品——被量化、被定价、被买卖。这是资本逻辑的铁律：只有能够被商品化的东西，才能进入资本的价值增殖循环。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本体论上拒绝成为商品。它的产出不可量化，所以无法被定价；它的调用不可预测，所以无法被契约固定；它的本质不可复制，所以无法被标准化地买卖。于是，资本面临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它需要这种能力——因为生产力发展要求它——却无法以自己唯一能操作的方式（商品化、剥削）去获取它。资本的解决办法不是改变自己，而是排挤这种能力。它通过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边缘化、通过将它窄化为“天才”的专利、通过将它排除在常规生产过程之外，来维持自身运行的一致性。这种排挤和窄化，使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被锁在了生产过程的边缘。它不是被消灭了——它仍然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存在着——但它被制度性地无视了。

第一阶段革命要做的，正是打破这个束缚。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劳动力的商

品化买卖，社会主义斩断了剥削的制度通道。劳动力不再是买卖的商品——它不再被拿到市场上出售——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再是商品。正如《要素的枷锁》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仍然处于商品化状态：它保留了劳动力的预生产、可计价性、可替代性、格式化以及相匹配的再生产机制。所不同的是，买卖环节被斩断了。这是一个关键的区分：商品化买卖的废除不等于商品化本身的扬弃。但正是这个斩断，使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再因为“无法成为商品”而被排挤在生产过程之外。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人类历史上，这种能力第一次获得了被正式对待的制度可能性。它不再是资本无法驾驭的“麻烦”，不再被窄化为少数天才的专利，而是可以被社会生产体系正视、讨论和尝试运用的对象。第一阶段革命，是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从剥削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这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根本标志。

第二重枷锁：要素化的框架。

但是，剥削框架的拆除只是第一步。社会主义虽然废除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但劳动力的生产和安排仍然以要素化的形式存在着。教育仍然是劳动力的预生产——将人塑造为符合社会生产需求的“合格劳动力”；按劳分配仍然将劳动还原为可计算的量——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劳动者的独特性被通约为抽象的劳动时间；劳动者在宏观配置中仍然是可替代的单元——一个工人可以被调配到另一个车间，一个教师可以被分配到另一所学校；统一的标准——专业目录、职称体系、考核指标——仍然在格式化着人的能力，将千差万别的个体压缩进有限的几个框子里。这些要素化的机制，构成了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第二重束缚。它不是剥削——它不占有剩余价值——但它仍然是压迫：它仍然将劳动力当作一种可以被识别、被衡量、被安排、被替换的物化要素来对待。在这种要素化的框架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不可衡量、不可安排、不可替换的能力——依然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二阶段革命要做的，正是打破这个束缚。通过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通过扬弃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和商品化安排，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使劳动力不再作为要素存在。教育不再是预生产，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禀赋去学习，而不是按照社会分工的需要被塑造；分配问题本身被扬弃——劳动者不再通过“分配”来获取生活资料，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地调用共有生产资料，直接为自己生产所需。这不是“按需分配”（因为分配仍然预设了一个分配者），而是“各取所需”，即从分配逻辑转向生产逻辑；劳动者不再是可替换的单元，而是不可替代的个体——每个人的独特性被承认、被尊重、被实现。第二阶段革命，是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从要素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是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的历史位置，正在于这两个解放的过程之间。

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革命——它打破了剥削框架，使得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第一次被正式地、公开地摆到了社会生产的面前。它不再是不可见、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开始谈论它、重视它、尝试运用它。这是几千年阶级社会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第一个真正的“历史舞台”——它第一次被看见了，被当作一种值得培养和调用的能力。

但是，社会主义还没有完成第二阶段革命。劳动力要素化的枷锁——劳动力的生产与安排环节——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虽然不再被剥削框架所排斥，但它仍然受到要素化框架的压抑。它被看到了，但还没有被充分释放；它被重视了，但还找不到合适的制度形式来容纳它；它被尝试运用了，但每一次尝试都遭遇着要素化惯性的阻力。这就是社会主义作为“过渡阶段”的内在矛盾：它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但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它已经打破了第一重枷锁，但第二重枷锁还没有被拆除。

第2节 首次正式登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社会主义社会

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完成了第一阶段革命，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被正式对待和运用的制度前提。这不是某种抽象的“原则承认”，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体现：剥削框架的打破，使得这种能力不再被系统性地排挤和窄化，因而它开始从被遮蔽的状态中浮现出来，进入社会生产的视野。

这种“正式对待”在实践中表现为多个层面。在意识形态层面，社会主义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生产的根本目的，这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合法性提供了价值基础。在教育领域，改革开始注重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独立判断能力——尽管这些改革在现实中困难重重，但方向已经确立。在劳动组织领域，出现了赋予劳动者更大自主权的尝试——职工参与管理、技术革新小组、合理化建议制度等，其目的正是要调动劳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判断力和创造性。在科技和文化领域，对原创性、独特性的倡导与对标准化的反思，都指向了同一种能力的价值。

然而，必须清醒地指出：由于先进理论的缺失——也就是说，人们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这两个本质不同的能力范畴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理论认识——这些尝试往往是模糊的、方向性的，并未正式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作为核心内容来对待。在实践中，这些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两者混为一谈：人们想要培养和调动的，名义上是“创造力”“判断力”“自主性”，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操作中，仍然用对待智力劳动的那套方法——量化指标、标准流程、绩效考核——去衡量和激励它们。结果是，真正属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那部分贡献（不可量化、不可预测、不可复制）仍然被遗漏，而能够被制度捕捉到的仍然是智力劳动的产出。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正式对待”，在现阶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方向的开启，而不是一种成熟的制度实践。它是在迷雾中摸索，是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试图辨认道路。但它毕竟迈出了这一步——它开始意识到，除了可量化、可预期的常规能力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能力值得重视。这种意识本身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常规劳动被替代得越多，那种不可替代能力的价值就越凸显，社会就越无法回避它。尽管这种意识目前还是模糊的、方向性的，尽管它与智力劳动的纠缠还没有被清晰地厘清，但方向的苗头已经出现。这正是过渡阶段的特征：不是已经完成，而是正在生成；不是清晰的蓝图，而是萌芽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开始进行初步的组织性尝试——试图将这种能力纳入社会生产的组织体系之中。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满足于“看见”这种能力，而是开始探索如何“运用”它：如何培养它？如何调动它？如何将它与社会化大生产结合起来？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下根本不会被提出（因为资本的回答是排挤它），而在社会主义下，它们第一次成为了需要认真对待的实践课题。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尝试是初步的。所谓“初步”，有两层含义。

第一，这些尝试的范围是局部的、不均衡的。在那些高度依赖创造性判断的领域——科学研究、战略决策、艺术创作——这种能力的调用有着更长的历史和更多的经验。在常规劳动占主导的领域，相关尝试则刚刚起步，甚至尚未开始。这种不均衡性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反映。

第二，这些尝试的性质是探索性的、试错性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成熟的理论可以指导。社会主义是在一片未知领域中摸索：什么样的教育能够真正培养判断力？什么样的劳动组织能够激发创造性而不陷入形式主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能够承认不可量化的贡献？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能通过实践中的不断试错来逼近。

这就是“初步”的真实含义：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被正式对待和尝试运用，但这种对待和运用还远远没有达到充分、系统、稳定的程度。它处在从“被忽视”到“被重视”、从“边缘”到“中心”的漫长过渡的起点上。这个起点是模糊的，但方向已经确定。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现实实践过程中，与这种初步的组织性尝试相伴随的，是一个深刻的困境：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很难被要素化的方式有效组织。这不是实践中的偶然挫折，而是这种能力的本性使然。

要素化劳动（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之所以可以被有效组织，是因为它具备可量化、可预期、可复制、可替代的特征。基于这些特征，社会可以为它制定标准、设计流程、建立考核、实施奖惩。这些管理手段的有效性，建立在劳动本身的可量化性、可预期性、可复制性之上。

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恰恰不具备这些特征。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详细论证的：它的调用是高度特异性的，与调用者独特的生命经验不可分离，因此不可复制；它的产出在本体论层面拒绝任何度量衡，因此不可量化；它的调用时机和产出方向都无法被预先确定，因此不可预测。正是这些特征——不是任何制度设计的缺陷，而是这种能力本身的存在论属性——决定了它无法被纳入要素化的组织框架。

因此，社会主义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组织性尝试，必然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张力：它必须尝试组织这种能力（因为生产力发展要求它），但它无法用现有的、在要素化劳动中被证明有效的组织方式来组织它。任何试图用行政命令、计划指标、绩效考核去“管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努力，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命运：要么失败，要么扭曲这种能力的本质。

失败的意思是，这些管理手段根本捕捉不到这种能力——你考核什么，劳动者就做什么，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贡献不在考核范围内，所以它根本不会被调动。扭曲的意思是，你强行将这种能力塞进要素化的框架里——要求创造力按计划产出、要求判断力用数字来衡量——结果得到的是创造力的伪币和判断力的空洞化。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组织性尝试，很有可能失败——或者说，它的“成功”只能是局部的、例外的、不可复制的。这恰恰是过渡阶段的辩证法：我们不得不尝试，因为生产力要求我们这样做；但我们也很可能失败，因为这种能力的本性拒绝被要素化地组织。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无能，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曲折。每一次失败都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次尝试的起点——它教会我们这种能力不能这样被组织，从而迫使我们去探索新的、非要素化的组织方式。

加剧上述困境的另一个因素是：在当下的生产力水平下，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智力劳动所运用的劳动力之间的界限，在实践中往往是模糊的。这不是概念上的混乱，而是历史条件不成熟的表现——分化已经开始，但远未完成。

在大多数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仍然与智力劳动紧密交织在一起。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在面对一批新规格的零件时，他需要调用标准的操作流程（智力劳动），同时也可能需要在现场做出即时的调整判断——比如发现某个螺丝的位置有偏差，是继续按流程硬装还是停下来调整？这个判断中就包含着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一个外卖骑手，在算法规划的路线之外，面对突如其来的交通管制或道路施工，他需要临时决定绕行哪条小路才能准时送达——这个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的、超出算法预设的决策，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一个建筑工人，在浇筑混凝土时发现某处模板有细微变形，他需要判断是继续浇筑还是暂停加固——这个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现场判断，同样不是可以被任何标准化流程所替代的。一个服务员，在面对一位情绪激动的顾客时，他需要判断是该严格执行规定还是灵活变通——这个即时的、情境性的决断，也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体现。

这些劳动者——工人、骑手、建筑工、服务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中都在调用着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只是这种调用往往不被看见、不被记录、不被承认。它与那些被制度认可、被

绩效考核、被流程规范的智力劳动（完成标准操作、达到规定产量、遵守服务话术）缠绕在一起，很难被清晰地剥离开来。

这种界限的模糊，给社会主义的尝试带来了双重困难。一方面，它使得针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专门制度设计难以精准落地——你无法为一种在实践中与智力劳动缠绕在一起的能力单独制定政策。任何试图“专门”对待它的政策，都会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你怎么知道在具体的劳动中，哪一部分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贡献，哪一部分是智力劳动的贡献？如果你分不清，你就无法为它设计专门的激励机制、培养方案、评价标准。

另一方面，它也使得那些量化管理的体系很容易在事实上压制作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因为可量化的部分（智力劳动）占据了考核的全部视野，而不可量化的部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根本不会被计入。当流水线工人的绩效只由他完成的产量决定时，他花时间判断和调整的那个动作反而可能降低他的产量；当外卖骑手的收入只与配送时长挂钩时，他为了应对突发状况而绕路的决策只会让他超时罚款。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调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意味着承担风险、牺牲绩效，久而久之，劳动者就会放弃这些判断，变得“只会按指令办事”。而那些敢于调用它的人，则可能因为“不按常规出牌”而受到制度的惩罚。

这种界限的模糊是历史的阶段性特征，而不是永恒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常规劳动被替代得越来越多，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越来越成为生产的关键环节——这种模糊性将逐渐降低。但在当下，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社会主义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尝试运用，是在界限模糊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本身就是过渡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3节 过渡阶段的辩证法与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阶段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处理，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的运动。这种运动有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它首次被正式对待和尝试运用。由于第一阶段革命打破了剥削框架，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第一次从被系统性地排挤和窄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它被看见了，被重视了，被纳入了社会生产的议题。在意识形态、教育、劳动组织、科技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各种尝试将其调用和组织起来的努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

第二，它仍然受到要素化框架的压抑。由于第二阶段革命尚未完成，劳动力的生产和安排仍然以要素化的形式存在。统一的教育标准、量化的绩效考核、计划性的岗位调配、可替代的劳动配置——这些要素化机制在客观上仍然压抑着那种不可量化、不可安排、不可复制的能力。因此，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虽然在趋势上被重视，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重重阻力。

第三，对它的组织性尝试很可能失败。因为它拒绝被要素化地组织，任何试图用要素化手段去“管理”它的努力，都难逃失败或扭曲的命运。这种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它根植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本性要与要素化框架之间的根本性冲突。但失败不是终点，而是探索新组织方式的必经之路。

这就是过渡阶段的辩证法。它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既被重视又被压抑，既被尝试运用又难以被有效组织，既被需要又被排斥。这种矛盾的状态，不是任何人的错误，不是制度设计的失败，而是历史本身在这个阶段的规定性。它是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内在特征——它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但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它已经打破了第一重枷锁，但第二重枷锁还没有被拆除。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经济、道德和精神上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劳动力要素化的痕迹，就是其中最顽固的痕迹之一。只要这个痕迹还存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就只能在重视与压抑、尝试与失败之间摇

摆，而无法获得彻底的解放。这不是社会主义“还不够好”，而是它“只能是这个样子”。任何试图用法令、用行政手段、用强制性的制度设计去“一步到位”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都只会适得其反——要么使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被更深的压抑，要么使制度本身陷入形式主义。

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已经成功地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组织起来了——事实上它很可能还没有成功。它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为这种能力的登场扫清了剥削框架的障碍，使得它能够被看见、被重视、被尝试运用。它通过建立公有制，为劳动力的非要素化组织提供了制度前提；它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生产的根本目的，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充分展开提供了价值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漫长过渡，是从剥削的解放到要素化的解放的中途。

在这条道路上，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将一步一步地从被压抑的状态中走出来。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会有反复，会有曲折，会有尝试，会有失败，会有进两步退一步的波折。但方向是确定的，因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不可逆转的，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正是这一要求的人格化体现。每一次在教育改革中被鼓励的独立判断，每一次在工作岗位上被赋予的自主决策空间，每一次对不可量化贡献的认可，以及每一次组织尝试的失败所留下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它们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矛盾运动的参与者。

最终，当生产力发展到足够的高度，当常规劳动被替代到这样的程度——使得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将主要的社会劳动投入到那种只有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去；当生产关系变革到这样的深度——劳动力要素化被彻底扬弃，劳动力的生产和安排不再以任何形式将人作为可替换、可计量、可支配的要素来对待——那时，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将获得完全的解放。它将不再被压抑，不再被扭曲，不再在智力劳动的缝隙中艰难求生，而是以主导性的姿态登上社会生产的中心舞台。它将参与社会性生产中的协商决策——用自己不可替代的判断力为共同体的建设方向做出贡献；也将在生活性生产中主导每个人自主的生产活动——用自己独特的审美和创造力，直接为自己生产所需。

那是下一章的主题。在此之前，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重视中尝试，在尝试中失败，在失败中学习，在学习中前进，一步一步地为那个最终的解放铺平道路。这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但它是唯一的路。因为最终，人的解放不是把每个人都变成标准化、可管理、可预测的劳动力商品，而是让每个人身上那种不可替代、不可量化、不可被要素化地安排的能力——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实现。社会主义不是在某一时刻突然“完成”这个任务，而是在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失败、每一次重新出发中，积累着走向那个终点的力量。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中途，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步的前行。而每一步前行，都是以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被重视、被尝试、在矛盾中艰难成长为标志的。

第五章 共产主义：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最终解放

在第四章中，我们考察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处境。它第一次从剥削框架中被解放出来，获得了被正式对待和尝试运用的历史机会；但它仍然受到要素化框架的压抑，与智力劳动的界限模糊，任何试图将其要素化地组织的尝试都面临着深刻的困境。社会主义是过渡，不是终点。那么，终点在哪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最终将走向何方？这正是本章要回答的问题。

如果说前四章的核心任务是“破”——破除资本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窄化与排挤，破除

剥削框架和要素化框架对它的双重枷锁——那么本章的核心任务就是“立”：在劳动力要素化被彻底扬弃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中，正面阐述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将以何种形态存在、如何被运用、如何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这不是对未来社会的空想式描绘——马克思拒绝为未来食堂开设菜谱，我们同样无意于此。这是一条从当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导出来的、不可回避的历史趋势。它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必然走向怎样”。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的许多核心命题——意识作为主要劳动力形态、工具代劳具体执行、社会性生产与生活性生产的区分、各取所需作为生产原则而非分配原则——在《要素的枷锁》第七章中已经做了系统的推演。那里是这些思想的第一次系统阐发。本章将在那个基础之上，以“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这一核心概念为新的锚点，对那套推演进行深化和重构。因此，本章既是对《要素的枷锁》第七章的继承，也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本章也将对《要素的枷锁》中的某些不成熟论断进行批判性审视——特别是其中关于“两条死路”的提法，将在下文予以澄清和扬弃。

第 1 节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必然登场

在展开本章的正面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逻辑做一个系统的回顾。这一矛盾首次在《资本的当代升维》中被系统重构，并在《要素的枷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和深化。它的完整表述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性生存依赖，与资本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资本主义私人掌控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个内在的、自我指涉的矛盾。它的“自我指涉”性在于：矛盾的两极不是两个外在的对立物，而是同一运动过程的内在同一性的两个环节。资本越是强化对劳动力生产过程的私人掌控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就越是破坏劳动力商品再生产的条件——而劳动力商品再生产的条件恰恰是资本赖以生存的前提。资本在运动中不断否定自身存在的条件。这不是资本“犯错误”，不是它可以“选择”避免的歧途，而是它存在方式本身所固有的悖论。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矛盾中的“劳动力商品化”，所指涉的是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劳动力——即体力与智力的总和。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范畴，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都在运用它。体力劳动者在搬运、操作、装配时，同样在调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智力劳动者在编程、设计、核算时，同样在调用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两者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而不是所运用的劳动力在本质上有不同。在本书中，我们侧重于讨论这种劳动力在智力劳动领域的运用，因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对体力劳动和常规智力劳动的系统性替代，被替代的部分越来越集中在可流程化、可标准化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智力劳动的传统领地。但这绝不意味着体力劳动不运用这种劳动力，也不意味着体力劳动所运用的这种劳动力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在《要素的枷锁》中，我们曾将这一矛盾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描述为“两条死路”：一条是工作场的无限扩张导致的绝对过剩（文明产能不耐受），另一条是生活场的无限扩张导致的意识殖民（存在性毁灭）。现在必须指出，这一提法是不成熟的，需要被批判和扬弃。

“两条死路”的框架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将同一个矛盾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当成了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从而遮蔽了矛盾的内在统一性和自我指涉性。实际上，工作场的扩张和生活场的扩张并不是资本需要从中“选择”的两条岔路。资本没有意志，它从不“选择”。资本的本能——增殖、扩张、吞噬一切——同时驱动着这两个过程。它不需要“选择”走向工作场还是生活场，因为它同时走向一切可以到达的领域。工作场的扩张和生活场的殖民，是同

一头巨兽伸向不同方向的两只触手，而不是这个巨兽面临的两个岔路口。

资本的政治代理人——资产阶级政府、国际组织、政策制定者——虽然拥有意志和谋略（正如《当本能拥有了谋略》所揭示的），但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调节资本运动的速度、形式和表象，而不能改变资本运动的基本方向。资本本身没有意志，但它的代理人可以为其赋予“远见”——然而这种远见只能在资本逻辑的范围内起作用，它不能取消资本逻辑本身。因此，无论代理人如何谋略，都无法让资本“选择”避开某一条路，因为资本没有“路”的概念，它只是在运动。

更重要的是，“两条死路”的框架未能充分把握矛盾的本质：资本在工作场中遇到的危机（常规劳动被替代、劳动力形态萎缩）和在生活场中遇到的危机（意识被殖民、存在性毁灭），不过是同一个矛盾——资本依赖劳动力商品化却无法容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它们共同的根源，是资本无法容纳自己生产力发展所催生出来的那种核心能力：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因此，正确的表述不是“资本面临两条死路”，而是：资本只有一条死路——它无法超越自身的内在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无论资本如何扩张，无论它的代理人如何谋略，都无法跨越这道界限。因为这道界限不是外在的障碍，而是资本自身存在方式所固有的悖论。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矛盾的核心。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生产过程。因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工具正在替代一切可流程化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生产过程中唯一剩下的、只有人才能提供的变量，就是那种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特异性判断、进行不可复制的决策、赋予独有意义、设定独到方向的能力。这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

但资本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这种能力。资本的存在前提是剥削，剥削的前提是劳动力能够被商品化：可量化、可预期、可复制、可控制。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恰恰拒绝这一切。它不可量化，因此无法被定价；它产出不定向且不可预测，因此无法被纳入劳动过程的计划和控制；它不可复制，因此无法被标准化地批量使用。资本可以排挤它、窄化它、无视它，但无法制度化地调用它。

于是，矛盾便以最尖锐的形式呈现出来：生产力要求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成为生产的主导性力量，资本的生产关系却从根本上拒绝它。这不是资本“选择”错误的问题，而是资本的存在方式本身与生产力发展方向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资本越是发展生产力，就越是在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心，而这种能力恰恰是资本无法驾驭的。当这种能力最终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时，资本的统治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这不是外部的推翻，而是内部的否定；不是偶然的崩溃，而是必然的扬弃。

正如《当本能拥有了谋略》所揭示的，资本的政治代理人可以通过国家干预、福利制度、思想文化治理等手段，延缓这一矛盾的爆发，甚至将其转嫁给边缘国家。但无论谋略多么高明，都无法改变矛盾本身。因为矛盾不是外在于资本的，而是资本自身的存在方式。资本的代理人可以调节它的运动轨迹，可以改变它的表现形式，但无法取消它的内在逻辑。而这一逻辑的终点，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最终解放。

第 2 节 劳动力要素化的扬弃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全面解放

资本主义的死路，不是人类的死路。它只是宣告了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以剥削为核心、以劳动力商品化为前提的生产关系——的历史界限。在这条界限之外，一个新的社会形

态正在地平线上显现。这个社会形态，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随意选择的社会制度，也不是从某种道德理想中推导出来的乌托邦。它是劳动力要素化漫长历史进程的终点——那个压迫的总根源被最终拔除的时刻。在《要素的枷锁》中，我们以“要素化”概念贯穿了从原始社会至今的全部压迫史，并界定了劳动力要素化的四个要件：可分离、可衡量、可安排、可占有。从原始社会末期劳动力从混沌中分离，到奴隶社会劳动力被定义为与矿产同质的资源（资源化）；从封建社会劳动力被绑定于土地和人身依附，到工业资本主义劳动力成为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商品（商品化）；从数字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铺展至全部生命领域——这数千年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将劳动力从人身上更彻底地剥离，都在使劳动者对自身劳动能力的掌控更加间接、更加微弱。每一次跃升，都是劳动力要素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从资源化到商品化，从商品化到全面商品化。而共产主义的意义在于：它不是在这一延长线上继续往前走，而是彻底终止这一进程本身。它不是用另一种方式安排劳动力，而是让劳动力不再作为“要素”被安排。共产主义要做的，正是逆转这一进程：让劳动力不再是可分离、可衡量、可安排、可占有的物化要素，而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然表达。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主要运用的劳动力将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特异性判断、进行不可复制的决策、赋予独有意义、设定独到方向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力与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劳动力）消失了或被贬低了。恰恰相反，它获得了全新的存在形式。这里需要做一个根本性的区分：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化为两个清晰的领域——社会性生产与生活性生产，而生活性生产内部又包含两个层次。

社会性生产，是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生产活动。它支撑着共同体的存续和进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基础科研的推进、公共服务的提供。在社会性生产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是主导性力量。劳动者投入的是不可量化的判断、决策、审美和意义赋予。具体可流程化的执行工作，则由先进的生产工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代劳。劳动者不再需要将自己的生命时间耗费在重复性的、执行性的工作上。社会性生产的组织方式是协商——每个参与者基于自己的意识和判断，提出他认为值得建设的方向，通过平等的讨论形成共识。

生活性生产，则是从社会性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它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满足物质生活资料需求的生产。劳动者需要什么生活资料，就借助社会共有的生产资料，直接为自己生产所需。他不需要先被雇佣、先赚取工资、再用工资去购买。他直接调用生产资料，直接投入自己的劳动——但这里的劳动，以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为主导。他判断需要什么、决定生产什么、把控生产过程，而具体的、可流程化的执行工作由工具代劳。这一层次解决的是“如何不依赖社会分配而获得生活资料”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中，体力与智力的总和（那种可流程化的能力）不是主导——它被工具所承接。

第二层次，是具身劳动。这严格来说已经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了。它是人的生命的展开，是人的自我实现，是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直接呈现。在具身劳动中，劳动者调用的是体力与智力的总和——那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异化、被碎片化、被工具化的能力。但在这里，它不再是被迫的、被安排的、为了谋生的劳动，而是自主的、自觉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一个人亲手为自己做一件家具，不是为了生存——因为工具代劳可以更高效地满足他的物质需求——而是因为他在锯、刨、凿的过程中，在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完整创造中，体验自己作为“制造者”的本质力量。一个园丁亲手种植花草，不是因为买不到食物，而是因为在泥土与种子的接触中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在这个层次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判断方向、赋予意义）与体力、智力的总和（执行、操作、感知）共同发力，二者的界限在具体的劳动活动中是模糊的——这正是具身劳动的魅力所在：它不是纯粹的“脑力”或“体力”，而是人的完整生命活动的展开。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体力与智力的总和是被异化的——它被流程化、碎片化、工具化，

劳动者在其中感受不到任何创造性。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它从社会性生产中退场，却在生活性生产的具身劳动中以最纯粹的形式复归。它不是作为被剥削的劳动力，而是作为人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不是“劳动消失了”，而是劳动终于从谋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东西。

这两个层次的界限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是清晰的。第一层次解决物质需要，高效、简洁、不占用过多生命时间；第二层次是自由的生命活动，是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真正实现。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没有人会因为“效率低”而惩罚他，因为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没有人需要出售劳动力来换取生存资料。这种自由，正是共产主义区别于一切此前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将获得它应有的社会形式。在资本主义下，它被排挤、被窄化、被无视——因为它无法被纳入资本的核算体系。在社会主义下，它被正式对待和尝试运用，但仍然受到要素化框架的压抑。在共产主义下，这些障碍将被彻底清除。不再有人问“这种能力值多少钱”，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商品；不再有人试图用量化指标去考核它，因为它不可量化；不再有人试图用计划或市场去安排它，因为它只能自主地调用。社会将第一次学会尊重这种能力的本质——不是将其纳入某种外部框架，而是为它的自主调用创造条件。

而体力与智力的总和——那种在几千年阶级社会中一直被作为“劳动力商品”对待的能力——也获得了它的复归。它不再是被买卖、被剥削、被异化的对象，而是成为人自我实现的具身劳动中的核心力量。人不再为了生存而劳动，而是为了劳动而生活。

第3节 社会性生产与生活性生产：劳动的分化与具身劳动的复归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成为核心劳动力之后，劳动形态本身将发生根本性的分化。我们在《要素的枷锁》第七章中已经对这两种生产做了系统区分，此处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社会性生产，是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生产活动。它支撑着共同体的存续和进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基础科研的推进、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再生产的保障。这一部分仍然需要对劳动力进行组织与安排，因为社会性生产涉及的是超越个体的、需要协作的、关乎共同体整体利益的活动。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完全取消这种组织与安排的需要。但是，社会性生产的组织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此时投入社会性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不可量化、不可预测、不可复制的能力——传统的组织方式（计划指令、市场交换、绩效考核）全部失效。你不能“命令”一个人做出一个不可复制的判断，也不能“购买”一个人的决策能力。社会性生产的组织，只能是一种新的形式：协商。每个参与者基于自己的意识和判断，提出他认为值得建设的方向，然后通过平等的讨论形成共识。这不是幻想中的“意见一致”，而是一种承认差异、尊重分歧、在碰撞中逼近真理的过程。这种协商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社会性劳动完全不直接反馈于劳动者个人——它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自觉的参与；它不是为了获得回报，而是因为认同共同体、愿意为共同体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判断。与此同时，社会性生产中的具体执行工作——那些可流程化、可标准化的任务——将由先进的生产工具承担。劳动者不再需要亲自去搬砖、挖土、编码、核算，这些工作由工具代劳。

生活性生产的第一层次——满足物质生活资料需求的生产——在上节已经阐述。这里重点讨论其第二层次：具身劳动。具身劳动是生活性生产中最具人类学意义的部分。它不解决生存问题（因为第一层次已经解决了），它解决的是“人如何度过自由时间”“人如何实现自己”

的问题。在具身劳动中，劳动者调用的是体力与智力的总和——那种在资本主义下被异化、被碎片化的能力——但这里的调用是完全自主的、以自身为目的的。一个人可以在具身劳动中体验到劳动的完整性：从构思到设计，从材料准备到亲手制作，从打磨调整到成品完成——他经历的是一个完整的创造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判断、审美、决策）与体力、智力的总和（操作、感知、执行）是共同发力的，二者的界限在实践中是模糊的。这正是具身劳动区别于社会性生产以及生活性生产第一层次的根本特征：它不是被安排的，不是被工具代劳的，而是人主动选择去做的；它的目的不是产出，而是过程本身。

具身劳动的复归，是对几千年劳动力要素化历史的最彻底否定。在奴隶社会，体力与智力的总和被当作资源，奴隶的劳动是为了主人的利益；在封建社会，它被绑定在土地上，农民的劳动是为了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它被商品化，工人的劳动是为了工资。在所有这些形态中，劳动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具身劳动中，体力与智力的总和才第一次成为目的本身——人为了劳动而劳动，为了在劳动中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而劳动。这不是劳动消失，而是劳动从“必然王国”跨入“自由王国”。

社会性生产与生活性生产的区分，还回应了一个经典难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图景，常常被批评为忽视了边际成本问题。一个人频繁切换活动，每次切换都有时间成本和精力损耗。但在我们的框架中，打猎、捕鱼、畜牧、批判不再是社会性生产中的“职业”，而是生活性生产中具身劳动的内容。它们的意义不在于产出多少经济价值，而在于人通过它们展开自己的生命。一个人切换活动的成本依然存在，但这不是“效率”问题——因为生活性生产（尤其是具身劳动）的目的是生命体验的丰富性，而非产出最大化。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恰恰需要这种多元的、跨界的、不受专业框定的环境。一个只会在一个狭窄领域内按部就班工作的人，他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很可能从未被真正调用过；一个在不同领域间游走、不断尝试、不断判断、不断创造的人，他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才得到了充分的展开。而具身劳动——那种亲自动手的、调用体力与智力的活动——正是这种展开的最直接形式。

第 4 节 各取所需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最著名的口号之一，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概念之一。流行的理解将它等同于“按需分配”——社会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分配生活资料。这种理解隐含着两个无法解决的困难：谁来判定每个人的“需要”？如果由社会来判定，就隐含着权力异化的风险；如果由个人自己来判定，又如何防止需要的无限膨胀？

我们在《要素的枷锁》第七章中已经对“各取所需”做了全新的解释：它不是分配原则，而是生产原则。它不是“社会给你什么”，而是“你自己为自己生产什么”。当生活性生产从社会性生产中解放出来之后，劳动者需要什么生活资料，就借助社会共有的生产资料，直接为自己生产所需（生活性生产第一层次）。他不需要等待社会的分配，不需要经过任何中介。他的需要由他自己判断，他的生产由他自己主导，他的产品由他自己消费。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扮演的不是“分配者”的角色，而是条件的提供者——提供公有制的制度前提、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工具的技术支撑。“各取所需”中的“需”，不是被资本制造出来的虚假欲望，而是人的真实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欲望是被资本人为制造出来的——广告、营销、社会攀比，不断地刺激人们购买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当生产不再以利润为目的，当消费不再被资本逻辑所驱策，人的需求将回归其本真的尺度：不是为了“拥有更多”，而是为了“活得更好”。这种真实需要是什么？只有每个人自己知道。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在具体情境中做出判断、赋予意义的能力——正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各取所需”中的“取”，不是从货架上拿取，而是生产出来。语言的局限在这里暴露无遗——“取”

这个字仍然带有“从某个地方拿”的含义，仿佛产品已经被预先准备好了。但共产主义的真义恰恰在于：产品不是被预先生产好然后等待分配的，而是在需要的时候被生产出来的。而生产的过程，本身就是劳动者调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展开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他不是“领取”生活资料，而是在“创造”自己的生活。

在本书第四章中，我们区分了形式解放与实质解放。形式解放是在要素化框架内增加劳动者的自主空间——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福利保障；实质解放是对要素化本身的扬弃——让劳动力不再作为可分离、可衡量、可安排、可占有的要素存在。社会主义完成了形式解放的飞跃，但实质解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共产主义，正是实质解放的完成形态。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形式解放与实质解放达成了统一。劳动者不仅在工作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而且这种自主权的根基被彻底改造了。自主不是因为制度给了你更多的空间，而是因为你所运用的劳动力——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本体论上就是自主的。它不能被安排，只能自主调用；它不能被衡量，只能自主判断；它不能被占有，只能自主支配。制度不再需要“给”你自主，因为制度本身已经不再将你当作可安排的要素。这不是说共产主义没有制度、没有规则。它仍然有——比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协商决策的机制、对生产工具的公共管理。但这些制度的功能不再是“管理劳动力”，而是“为劳动力的自主调用创造条件”。它们不是用来约束你的，而是用来保障你的——保障你拥有平等的生产资料调用权，保障你的声音在协商中被听到，保障你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垄断而失去调用工具的机会。制度从支配的工具变成了解放的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处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段话常常被误解为“物质生产不重要”或“共产主义不需要劳动”。但马克思紧接着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共产主义的自由，不是劳动的消失，而是劳动性质的彻底转变。在必然王国中，劳动是“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为了生存而劳动，为了他人的需要而劳动，为了资本的增殖而劳动。在自由王国中，劳动不再是“规定要做的”，而是自觉自愿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这种转变的核心，正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解放，以及体力与智力总和的具身劳动复归。当一个人劳动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想要创造、想要表达、想要实现自己时，他的劳动就进入了自由王国的领域。他既可以借助工具高效地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生活性生产第一层次），也可以亲手制作、亲身劳动，在具身劳动中体验生命的完整与丰盈。

《当本能拥有了谋略》揭示了政治实体如何通过国家干预、福利制度、思想文化治理，赋予盲目的经济力量以“远见”和“谋略”。然而，谋略可以延缓矛盾，但不能消除矛盾。无论政治实体的操作多么精妙，它都无法改变那个内在的、自我指涉的矛盾：资本依赖劳动力商品化，但资本的私人掌控逻辑使它无法容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而生产力的发展，正在使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性生产的主导性力量。资本的政治代理人可以暂时压制对这种能力的承认，可以通过思想文化治理让劳动者相信“创造力是少数天才的专利”，可以通过福利制度缓解劳动者被榨取后的痛苦，可以通过国际层面的价值引力将矛盾转嫁给边缘国家——但这些都只是在拖延，而不是在解决。历史定点论的启示正在于此：定点不是人们选择的目标，而是矛盾运动不可避免节点。无论政治实体如何调整策略，无论路径如何曲折，那些由经济力量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定点，终将被历史撞上。而这个定点，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最终解放，以及体力与智力总和在具身劳动中的自由复归。

自由王国，不是劳动的终结，而是劳动的真正开始——那个被劳动力要素化压抑了数千

年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劳动，以及体力与智力总和作为具身劳动的重新绽放。当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的主人，当每一个人的判断、决策、审美、意义赋予的能力都被充分调用和尊重，当劳动从谋生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那时，人类才第一次从必然王国跨入了自由王国的门槛。这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跨越。它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常规劳动被替代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将主要的社会劳动投入到那种只有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去；它需要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使劳动力要素化被彻底扬弃，使劳动力的生产和安排不再以任何形式将人作为可替换、可计量、可支配的要素来对待；它还需要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每一个劳动者都意识到自己身上那种不可替代、不可量化、不可被安排的能力，并为之斗争、为之夺回。

然而，在展望这一前景时，必须做出一个至关重要的澄清，以避免滑入技术乐观主义的陷阱。我们在前面论述了先进生产工具如何代劳可流程化的执行工作，如何放大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潜能——但这些论述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这些工具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被使用的？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系统，它们没有阶级属性，没有政治立场，没有内在的“解放意志”。一把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刀还是那把刀，使用者的目的和所处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它的功能。同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非但没有服务于劳动者的解放，反而成为更高效剥削的工具——算法调度骑手、数据监控行为、自动化替代岗位，这些都是技术在资本逻辑下的现实应用。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的解放潜能，只有在特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才能实现。这正是我们在全书反复强调的两阶段革命之所以必要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第一阶段革命——打破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公有制——这些工具就会继续被束缚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成为资本增殖的加速器，而不是劳动者解放的推进器。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技术发展只能间接地推动劳动者的解放——它通过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常规劳动被替代、劳动力形态萎缩、资本无法容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加速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从而为革命的爆发创造客观条件。但它不能直接服务于劳动者的解放，因为只要生产资料仍掌握在资本手中，技术就是资本的技术，算法的优化方向是利润最大化，自动化的目标是削减用工成本。只有经过第一阶段革命，当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当生产的目的从价值增殖转变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工具才第一次有可能被纳入解放的轨道——服务于社会性生产中的协商决策，服务于生活性生产中物质需求的自主满足，为人从社会性生产的强制中解放出来创造条件。这不是技术决定论，而是生产关系决定论：技术是变量，但生产关系是函数。同样的技术输入，在不同的生产关系函数中，产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因此，我们在展望共产主义时论述的工具代劳、意识放大，不是对技术本身的盲目崇拜，而是对“经过两阶段革命之后、在公有制条件下”的技术应用的逻辑推演。技术的解放力量不是自动到来的，它需要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去夺取、去改造、去赋予它新的社会形式。而这场革命，正是从每一个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夺回开始的。

这个斗争已经在进行。每一次在教育改革中被鼓励独立判断的学生，每一次在工作岗位上被赋予自主决策空间的劳动者，每一次对不可量化贡献的认可，每一次拒绝被算法安排的努力——他们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他们每调用一次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都是在为这种能力的最终解放增添一分力量。他们不是被动的历史旁观者，而是主动的历史参与者。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承继下来的条件，是劳动力要素化数千年的遗产——压迫、剥削、异化、被安排感。但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是扬弃这一切的历史。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中途，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步的前行。而每一步前行，都是以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被重视、被尝试、在矛盾中艰难成长为标志的。当这个成长最终完成，当作为劳动力的

意识从资本和要素化的双重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当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在具身劳动中重新成为人自我实现的途径——人类将第一次迎来真正的自由:不是为了生存而劳动,而是为了劳动而生活。

这是本书所要抵达的最终命题,也是《要素的枷锁》《资本的当代升维》《市场还是计划?夺回!》《当本能拥有了谋略》以及本书共同指向的那个不可绕过的历史定点。百年争论,到此终结。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而斗争的方向,已经清晰: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让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从每一个劳动者的生命中绽放出来。